

# 司马迁

周煜华

中外名人传记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 司 马 迁

周煜华 编著

#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童年时代.....	(4)
第二章 南北漫游 .....	(11)
第三章 漫漫仕途 .....	(39)
一、入仕 .....	(39)
二、奉使蜀滇 .....	(46)
三、扈从封禅 .....	(52)
四、负薪塞河 .....	(61)
五、太史令 .....	(65)
第四章 祸起李陵案 .....	(81)
第五章 《史记》 .....	(95)

# 前 言

中华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到现在，已有几千年了。在这数千年之中，不知上演了多少幕悲喜剧，不知重复了多少回月缺月圆、聚散离合。来来往往的人们，在历史之中穿梭，纷纷纭纭的历史，在人群中前行。大江东去，淘去了多少泥沙，也留下了多少沉淀。来来往往的人们，有的死了，有的还活着；有的永远死了，有的却永远活着，如他，司马迁！

司马迁的名字是和《史记》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座丰碑，《史记》从史学和文学两方面给人们做出了范例。3000 年的历史画卷，在《史记》中得以一一展现，3000 年的灿烂文化，在《史记》中得以宏扬光大。鲁迅评《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毫不过分的。

司马迁将《史记》奉献给了人类文明，将自黄帝到汉武帝 3000 多年的历史展示给了人类社会，然而他自己的生平事迹，却几乎被历史遗忘了！这难道是命运的捉弄吗？一个记载了历史的人，历史却没有将他记载下来。我们现在能了解到的、能查证到的，有关司马迁生平事迹的记载太少了。历史上有关司马迁的传记资料，主要的只有《史记》中的《太

史公自序》和《汉书》中的《司马迁传》两篇，而且《司马迁传》中的内容，也多是《太史公自序》的重复。历史太吝啬了，竟不给我们以了解司马迁身世生平的机会；历史也太无情了，竟然将这一伟人的许多踪迹都冲刷得干干净净！

我们今天能奉献给各位读者的《司马迁》，实际上并不是司马迁一生事迹的记载，而只是他生命的部分梗概，既不完整，也缺乏细节的描写，使他的形象难以鲜明起来。但我们已经尽力将他的一生展示给大家了，拙劣的文采，在于我们的浅陋；材料的匮乏，在于历史的遗漏。然而传记毕竟是传记，不接受绮丽的想象、奇特的设想、大胆的夸张。司马迁的一生在历史的载述上留下了许多空白，这些空白就作为后来者思索的空间吧！

也许历史就是这样。历史长河亘古不变地流着，带走了多少故事，留下了多少遗憾，还有一串一串再也解不开的疑团。现代人纵然用尽了各项高科技工具，动用了各门学科的知识，穷尽了推测、想象、演绎、考证各种方法，这些疑点却成了历史中的黑洞，除非时光倒流，否则许多历史的真相是永远不能得以见天日的了！

但，正因为有了空白，一幅图案才显得错落有致，更有韵味；正因为有了缺陷，断臂女神维纳斯的美才得以让人惊叹；正因为有了遗憾，圆明园的废墟才有了它存在的价值。司马迁谜一般的一生，才使得他的《史记》更添传奇的色彩！

我们今天所能了解到的是：他生活在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汉武帝时代，幼年在夏阳（今陕西韩城县芝川镇）度过，10岁左右随父亲司马谈到了京师长安，20岁时开始漫游

祖国的大江南北，回来后不久，做了郎中。以郎中的身份，他多次侍奉汉武帝出巡、祭祀，并奉使蜀滇；公元前108年，他做了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史记》的著述工作开始；公元前98年，因为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被处以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愤而著书，书成后不久就离开了人世。卒年不可考。

但司马迁毕竟留下了一部《史记》，我们可以从《史记》中去揣摩他的思想、他的学识、他的人生体验。纵观《史记》全篇，中国文化的各方面，无一不在其中体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天文、地理、风土人情，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帝王将相、文人学士、游侠刺客、佞幸滑稽，社会的各个阶层，《史记》中无一不囊括，无一不博极。司马迁的渊博学识、深湛思想、过人才华、绚烂文采，也都在其中体现出来。《史记》既是我们了解自黄帝到汉武帝之间3000年历史的依据，也是我们研究司马迁本人的依据。然而《史记》太深奥了，它就像是无边的大海，我们不过是这海滩上的游人。相对于它来说，我们太渺小，太无知了，只能面对着大海感叹，感叹它的广博，它的宏伟；感叹它的含蓄、它的悠远；感叹它的壮丽、它的异彩纷呈；同时，也感叹它的深不可测。

中国人迈向世界的步伐中，有《史记》在闪光；中国人走向繁盛的进程里，有司马迁的不朽功勋在呐喊，在歌唱。

## 第一章 童年时代

陕西韩城县附近，有一座龙门山，它横跨黄河，双峰对立，据说是当年大禹治水时为疏导黄河而开凿的。相传在远古的尧舜时代，龙门山将黄河从中截断，挡住了黄河水的去路，致使洪水泛滥成灾，生灵涂炭。尧派鲧去治水，鲧采用堵塞的办法，治了九年也没有成效，尧一怒之下，命令舜将鲧杀了，并命令鲧的儿子禹去继续治水。禹考察了龙门山的地势，决定开凿龙门山，以疏导黄河。龙门山被劈开后，河水畅通无阻，水患日渐平息，人们又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从此龙门山也就隔岸相守，犹如两扇大门一样对峙在黄河两岸。黄河在此处水流湍急，奔腾咆哮，气势十分壮观。传说每年都有许多大鲤鱼游集到龙门山下，争先恐后地跃龙门，跳上去的，就变成龙升天了，跳不上去的，只得垂头丧气、抱憾而归，养精蓄锐，以待来年再试。民间广为流传的“鲤鱼跳龙门”的故事，就是由此而来。龙门山在人们心目中，充满了神话色彩。公元前 145 年，我国伟大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司马迁，就诞生在离这个神秘的地方不远的芝川镇。

司马迁出生在一个史官世家，他的祖先世代执掌史官的职务，只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时局纷乱，曾经中断了

很长时间，一直到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才重新开始了司马家族的“史官”世业。我们先来谈谈司马谈。

司马谈生活在西汉王朝的文帝、景帝时代，他学识渊博，从小就立志出任史官，献身于史学方面的事业。古代的史官叫做“太史”，除了记录史事，搜集、保存典籍文献等职责之外，还要掌管天文星象的观测，阴阳吉凶的占卜之类的事情。要做史官，就必须具备这些方面的知识。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司马谈首先向当时著名的天文学家唐都学习天文知识，学习观测星象；然后又向《易经》专家杨何学习有关《易经》的知识，掌握阴阳占卜的方法；这两个方面的知识具备之后，司马谈并不满足，他知道仅仅凭着这些还不足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史官，于是他又向黄老学派的黄生学习道家的哲学思想。黄生在历史上是很有名的，《史记·儒林列传》中曾记载了他与当时儒学大师辕固生在汉景帝面前对商汤伐桀、武王伐纣事件的辩论过程。辕固生从儒家观点出发，认为汤武伐桀纣，是顺应天命，顺应民心的事，那么商朝、周朝的各自建立也是合乎民意，合乎天理的，以此推出秦末农民起义推翻秦王朝的必然性，推出汉王朝出现的合理性；同时也提醒统治者要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笼络民心，以免重蹈覆辙。黄生则从巩固新生的封建政权出发，为防止大臣和民众们不服从统治，起来反抗，提出不同的见解——汤武伐桀纣并不是顺应天理、顺应民心的事情，商、周王朝的出现不过是汤武反叛君主、不安分守己的结果。黄生的意思是说，无论统治者怎样残暴，怎样腐朽，臣民也只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一丝一毫的叛逆思想，一点一滴的反抗言行，都是要不得的。黄生反对动乱

的思想对于当时新建的汉王朝很实用。试想一下，秦末农民起义后，刘家坐了天下，建立了西汉王朝，统治者用不着再考虑汉王朝的建立是顺应天命还是叛逆君主的问题，反正王朝的建立已经是事实，但是汉王朝建立之后会不会又有民众起来反抗，会不会重蹈秦王朝的命运，被其他王朝所取代呢？这正是汉初统治者所担心的，所以黄生的思想受到了当时统治者汉景帝的重视，成为封建政权统治的正统思想。对于民众，黄生以汤武伐桀纣而夺天下的不合理性，告诫民众要安守本分，万不可存动乱之心；对于统治者，黄生又主张“清净无为”，减轻剥削和压迫，实行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以利于生产的发展、民心的安定，最终达到巩固汉王朝统治的目的。历史证明，黄生的这一套思想对于汉初政权的稳固和社会的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司马谈向黄生学习黄老思想，逐渐成为了黄老思想的代表人物。

汉武帝建元年间（公元前140年——公元前135年），司马谈终于如愿以偿，做了“太史令”，从此一步一步实现他献身史学的理想。

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封建政权的巩固，封建统治者对内需要加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对外需要反击匈奴的掠夺侵扰，因而已不再满足于“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统治办法，到汉武帝时，董仲舒——一代儒学大师的学说被采纳，其思想代替黄老思想而成为了当时的统治思想。持黄老思想的司马谈常常感到很压抑、苦闷，但他并未因此而放弃自己的观点，在其文章《论六家要旨》中，司马谈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的学说分别进行了评述，大力推崇

道家思想。思想上与当时统治思想的悖离也并没有使司马谈放弃献身史学的理想，一方面，他跟随汉武帝参加各种祭祀典礼，并和祠官宽舒共同制定了祭祀后土的仪式，履行他作为“太史令”的职责；一方面，他抽时间整理古籍古史。在整理过程中，司马谈常常感叹自孔子之后，史事零乱，无人著述，因而撰述历史逐渐成了司马谈的夙愿。

司马谈致力于史学的态度自然也影响到了他的儿子——司马迁。

司马迁出生的时候，司马谈还未做官，在家乡芝川镇以务农为生，但他不同于一般的普通农民，他有从事史学工作的美好愿望，他向唐都、杨何、黄生学习知识，学识渊博，因而司马迁从小就受到了很好的文化熏陶。小时候的司马迁，常常跟小伙伴们去放牧，在广阔的芝川原野上，小司马迁和伙伴们对周围的景象产生了美好的遐想，尤其是充满了神话色彩的龙门山，对司马迁更具有巨大的诱惑力。他和小伙伴们说起龙门的古老传说，遥望着北面耸立的龙门山，不禁引发了对历史传说和神话故事的浓厚兴趣。

司马谈对儿子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他希望司马迁能继承自己的事业，当上史官，为社会的史学事业做贡献。因而在司马迁很小的时候，就督促司马迁学习以历史为主的知识。司马迁 10 岁的时候，就能诵读《左传》、《春秋》、《国语》等古代史籍了。汉朝的时候，一个学童想步入仕途，不仅要能背诵一些制度条文，能理解、发挥这些条文的意思，而且要会写 9000 个字，会八体的书写，这样才有被一级一级推举做官的可能。文字的书写在当时要求非常严格，一个字写错，就

有可能丢性命。在如此严厉的文字制度下，小司马迁要有多大的恒心和毅力才能学会八体的书写，才能会写 9000 个字，才能会诵读诸如《国语》之类的古文啊！

司马谈做了太史令的这一年，司马迁随父亲来到了长安，从此，他的生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京师长安一片繁华景象，金碧辉煌的建筑星罗棋布，街道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各种叫卖声此起彼伏，……小司马迁对这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和向往，孩童天然的贪玩之心也使他对于一些游艺场所跃跃欲试，但是在父亲严格的督促和教诲下，他排除了一切外来诱惑的干扰，一心一意地学习。

长安人才云集，给司马迁提供了更好的学习环境。司马迁曾经向当时有名的古文大师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又向儒学大师董仲舒学习《春秋》。孔安国和董仲舒的思想、学说对司马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董仲舒的儒家思想几乎影响了司马迁的一生。

董仲舒在中国历史上可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思想影响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他少年时学习非常刻苦，钻研古籍，到了一连几年都不向园子看一看的地步——人们常说的“三年不窥园”，即是由此得来的。他后来名气越来越大，被举荐做了博士。博士是古代的一种官职名称，在当时没有什么权力。董仲舒大量的散闲时间仍旧用来钻研儒学、讲授儒家经典。此时的西汉，已经是国强民安，一派强国景象，公元前 141 年，汉武帝登基。汉武帝是推崇儒家学说的，但其祖母窦太后却好黄老之术，窦太后在世时，汉武帝不敢违背太后的意愿，他公开推行儒家思想是在窦太后去世以后（公

元前 135 年)，此时司马迁正好离开家乡，随父亲来到长安。汉武帝推行儒家思想的最后障碍消除了，他开始毫无顾忌地实行他的计划。可是究竟采用什么样的统治思想呢？依赖这种思想，又怎样很好地治理臣民呢？怎样让人民永远服从我汉王朝的统治呢？……汉武帝迫切需要解决这些问题。公元前 134 年，汉武帝采取贤良对策的方式，招集人才。贤良即为有学识的人，对策就是在皇帝面前发表自己的见解，接受皇帝的提问。董仲舒在这次策试中脱颖而出，受到汉武帝的器重。汉武帝对董仲舒进行了三次策问，内容全部涉及天人关系（后人称之为“天人三策”）。董仲舒得到这个抒发见解的机会，马上不失时机地宣扬他的思想。他说，君王的权力是上天赋予的，君王统治人民，这是天上神的意愿，因而君王有主宰一切的权利；要统一人民的思想，就要废除其他思想学说，独尊儒术。君王的权力既然是上天赋予的，必然也要受到上天的限制，因而君主的所作所为，不能违背天的意愿即天道。这些思想正好迎合了汉武帝一直想加强君主专制的想法，也解决了他原来考虑的一系列有关统治思想的问题，因而立即接受了董仲舒的思想。贤良对策之后，董仲舒担任江都易王的国相，后来由于小人拨弄是非，被降为中大夫。中大夫是郎中令的一个属官，权力不大，只能在宫廷中提提建议。

遭到降职后的董仲舒在长安以讲授《春秋》来宣扬他的学说，减缓心中的忧闷之情。司马迁就是在这段时期内向董仲舒学习《春秋》的。司马迁接受了董仲舒的一些思想，但是董仲舒的思想并没有在他心中占主要位置，在他后来的巨

著《史记》中，也只把《董仲舒》归入《儒林列传》中。

勤奋刻苦的司马迁，在良师的指导下，学识越来越广博，成为远近闻名的才子。他深厚的学术功底，使他具备了入仕的条件，更使他成了一个年轻博学的人才。

公元前 139 年，汉武帝开始建造自己的陵园，地址选在他母亲王太后的原籍槐里县茂乡。汉武帝看中了这个地方的风水，但是嫌这个地方太荒凉，他可是个爱热闹的人，死后也是不甘寂寞的，于是他改茂乡为茂陵县，并鼓励人民迁往茂陵，凡是自愿迁移到茂陵居住的人家，每户赏赐钱 20 万、田二顷，如此丰厚的待遇，吸引了不少人往茂陵迁移。此外，汉武帝又在渭水上面架起一座便门桥，连通长安和茂陵，方便了两地之间的联系，茂陵逐渐繁盛起来。公元前 127 年，汉武帝听取了主父偃的主意，将各地的豪强地主和家产超过三百万的富裕之户迁到茂陵，这样不仅有利于茂陵的繁荣兴盛，而且更有利于汉武帝加强对豪强地主的管制。作为一名朝廷官员，司马谈也迁到了茂陵居住，从此司马迁开始了他在茂陵的生活。

## 第二章 南北漫游

公元前 126 年，司马迁 20 岁。在父亲的鼓励和支持下，怀着继承祖辈史官事业的志向，他暂时停止了对古文、经传的攻读，开始访游名山名川，考察各地的风土人情，搜集各方面的历史材料。

司马迁从京师长安出发，首先以南方为考察目标。他从关中南部的武关（今陕西商县东部），到达南阳（今河南南阳市），然后到达南郡（今湖北江陵县），这一路上有许多历史故事和传说。据说秦文公的时候，有人打猎捕到了一种怪兽——“狷”，猎人们对这种怪兽议论纷纷，不知道该如何处置才好，后来决定献给秦文公，说不定秦文公一高兴还会给些赏赐呢。猎人们抬着狷兴高采烈地去向秦文公领赏去了，正走着，迎面过来两个小孩，一男一女，长得十分可爱。这两个小孩告诉猎人们说：“这狷不是个好东西，它生活在地下，专门吃死人的脑浆呢。”猎人们一听，顿时对狷产生了很深的憎恶之情，想想看，谁没有亡故的亲友啊，这狷居然吃死人的脑浆，也太可恶了！猎人们愤怒极了，想要马上处死狷。狷突然说话了：“这两个小孩可是件宝贝，得到他们可就大富大贵了。得到男孩，可以称帝为王；得到女孩，也可称霸天下

……”话音未落，猎人们已纷纷扑向那两个小孩，两个孩子吓坏了，慌忙变成两只野鸡，各自飞去。猎人们使劲跑啊、追啊，野鸡早没了踪影，只得垂头丧气地回去了。这两只野鸡到底飞到哪里去了呢？后来有人说看见它们了，雄鸡飞到了南阳，雌鸡落到了陈仓（今陕西宝鸡）。后世的人们把这个神话传说与历史史事结合起来，说秦霸王、秦始皇以及刘邦等都是沾了这两个地方的灵气，才能称霸天下，建功立业的呢！司马迁考察了这一带的地形，只见地势险峻，古木阴森，好一个兵家常争之地！连绵起伏的秦岭山脉、富庶的关中盆地，使司马迁不禁浮想联翩，思绪飞到了那战火纷飞的年代。

从南郡渡江之后，司马迁来到了湖南长沙北面的汨罗江。汨罗江是我国伟大诗人屈原自沉的地方。江水波浪翻滚，似乎在诉说着对诗人的思念，诉说着对奸人的深恶痛绝之情。凭吊往事，司马迁对这位伟人产生了无限的敬仰与同情之心。诗人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对奸佞之徒的痛恨，对自己政治抱负不得施展的叹息，似乎一一在司马迁脑海中闪现；诗人作品诸如《离骚》、《天问》、《招魂》等等之中流露出来的奇特的想象、大胆的夸张、绚烂的文采、完美和谐的韵味，让司马迁赞赏不已。多么杰出的人才啊！怎么老天这么不公平，竟让他遭到如此悲惨的命运呢？司马迁想到屈原的遭遇，心情十分沉重，步履也越发缓慢起来。滔滔的江水依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流着，没有停息，江边的树木青了又黄、黄了又青，依旧在默默地重复着兴衰的规律，江岸的人们来来往往，为着各自的生活奔波，还有人记得这位伟大的诗人吗？司马迁在汨罗江边徘徊了又徘徊，陷入了深深的思索当中。阵阵

清风吹来，江水泛起层层涟漪，岸边的树木轻轻摇晃着身躯，远处不知是哪位在吹箫，哀怨的乐声由清风徐徐送来，把周围的事物都染上了一层凄凉的色彩，年轻的司马迁走着、想着，不知不觉已经泪流满面了。他在江边徘徊了很长时间，各种复杂的感情荡涤着他的心胸；对屈原的敬慕、同情；对楚怀王、顷襄王的指责、不满；对靳尚、子兰等人的愤恨，还有对历史的感叹等等。司马迁又想起父亲的叮咛，想起父亲对他的期望，他立志继承他父亲事业的信念更坚定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诗人的话给了他无比的信心和勇气，他深深地舒了口气，心情渐渐开朗起来，紧锁的眉头也渐渐舒展了，“我要仔细搜集史料，整理历史史实，将那些仁人志士、明君贤臣的事迹载入史册，让他们的业绩永远受到后人敬仰，让他们的音容笑貌永远在后人心中留有印象；将那些齷齪之辈、残暴之徒的不耻行径都要如实记载下来，让他们的劣迹一一暴露在人们的面前，去面对世人的指责；将古今历史事件详细地、原原本本地展示给人们看，让它们接受历史公正的评判。”司马迁心中充满了对未来事业的向往和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他恋恋不舍地朝江面看了看，深深鞠了一躬，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离开了汨罗江后，司马迁又凭吊了贾谊的遗迹，然后从长沙溯湘江而上，到了湘南零陵郡营道县（今湖南宁远县）境内。这里有座九嶷山，也是个充满神话色彩的地方。山上有斑竹，远远看去，像点点泪痕洒在竹杆上，据说这是当年舜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的血泪化成的呢。传说尧年老时，要选定继承人，大家都推举有才德的舜，尧为了考验舜，就让

舜帮助他处理各种事情，舜在办理这些事情的过程中显示了他的才识，得到尧的赏识，于是被派到各地巡视。舜每到一个地方，都亲自仔仔细细地考察，不敢有半点疏忽，并虔诚地倾听民众们的意见，态度十分谦虚。舜一年四季都在外面巡行，他的两个妃子娥皇和女英日日担心他的安危。尧考验了他三年，然后将部落联盟首领的位置让给了他。舜即位后任用贤人，让禹去治理水土，让契管理人民，让益掌管山泽，让皋陶做大理，这一安顿好以后，他又放心地去巡游了，由于日夜操劳，舜病死在了南巡途中。娥皇和女英在家里等啊、盼啊，却传来了舜的死讯。她俩痛不欲生，哭哭啼啼地去沿着舜的足迹寻找舜的葬身之地，历经千难万苦，终于找到了舜的安葬地——九嶷山，可是坟墓在哪里呢？娥皇和女英悲痛交加，对着满山的竹子放声大哭，行人听了都心酸得落下眼泪，天上的云彩似乎也被感动了，静静地停在九嶷山的上空，洒下了同情的泪水。濛濛细雨中，竹叶沙沙地响着，缓缓地扬起来，又落下去，似乎在安慰她俩，也似乎在同她们一起为舜的死去而哭泣。娥皇和女英哭啊哭啊，泪水哭干了，眼睛里都流出了血水，血泪洒在竹杆上，化成了泪痕牢牢地印在了上面，天长日久，九嶷山上的竹子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司马迁被这一美丽的神话传说深深地打动了，他登上九嶷山，在满山的竹林中慢慢走着，穿行于棵棵斑竹之间，舜真的葬在这里，娥皇和女英真的到过这里吗？司马迁钻研历史的兴趣更浓了。斑竹的传说寄托了人们对娥皇女英的怀念，也显现了人们丰富的想象力。

司马迁又踏上了远行的路程。他从湘南辗转到了湘西，顺着沅水而下，然后又沿着长江东行，南登庐山。这一带河流密布。小时候龙门的传说又涌上心头，司马迁想到了大禹治水的故事。这里河流众多，并且都向东方流去，最后汇集成大江，会不会与当年大禹治水有关呢？司马迁对自己的这一想法兴奋不已，他一时间思绪连翩，想起了许许多多有关大禹治水的美丽传说。小时候和伙伴们放牧时对龙门山的好奇与向往又重新涌上心头，然而龙门山是暂时去不了了，司马迁想了想，决定到会稽山去考察一下。

会稽山位于现在浙江绍兴县的东南，据说大禹做了部落联盟首领之后，曾经在这里约集各部落头领，对各头领的功劳进行评定，会稽山因此而得名。禹死后葬在会稽山，这里自然留下了许多大禹的传说。会稽山环境优美，景色宜人，司马迁陶醉于山水之间，竟然有些留连忘返了。

会稽山上有一孔洞，深幽不见底，有人说大禹曾经进去过，也许还有过一段奇遇呢，也有人说那是大禹用来收藏书籍的地方，说法不一，但是后来的人就再也没有进去过了。司马迁饶有兴趣地去看了这个被人称之为“禹穴”的孔洞，又参观了大禹治水的其他遗址，大禹的形象在他头脑中越来越清晰起来。大禹治水，有口皆碑。13年的艰苦努力，“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公而忘私的精神，领导人民开沟凿渠、开垦良田桑土的伟大业绩，……这哪一样都是历史否认不了的，哪一样都深深地记在了历代人民的脑海里。人民是公正的，人民是善良的，人民崇敬他、感激他、爱戴他，他的事迹历代传颂，敬仰他的人渐渐将他当成了神，一个一心一意想着人

民、踏踏实实解决人民困难的神，一个简朴淳厚、德才兼备的神。他的一言一行，以及许多和他有关的事件都渐渐添加进了后代人民丰富的想象和联想，变得越来越神秘起来了，不过远古时代的事情，没有详尽的记载，人们也只能凭想象来猜测了。历史上许多人物、事件都是这样的。

会稽山的历史传说很多，春秋时期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公元前 496 年，吴王阖闾率兵讨伐越国，双方激战不止，死伤惨重，局势僵持不下。后来阖闾不小心负了伤，病情严重，不久就死了。吴军群龙无首，顿时乱成一团，被越军打得落花流水，惨败而归。吴国太子夫差听了父王死去的消息，嚎啕大哭，对越王恨得咬牙切齿，发誓一定要报仇雪恨。即位为王以后，他加强练兵，励精图治，国力越来越强大，他攻打越国的信心也越来越足了。而越王呢，得胜之后沉溺于胜利果实之中，对将士论功行赏，昼夜宴欢，逐渐放松了对吴国的戒备。公元前 494 年，吴王率兵再次攻打越国，越王没有防备，仓促中派兵迎战，但已经不再是吴国的对手，兵强马壮的吴军一鼓作气，攻到了越国的都城，越王勾践节节败退，最后在会稽山向吴王求和。吴王夫差想杀了他给父亲报仇，后来在臣子们的建议下，将勾践带回吴国，专门伺候他。勾践只得忍气吞声、小心翼翼地侍奉着夫差，就像仆人一样。他心里对这一切耿耿于怀，日夜思考着要东山再起，洗刷这些耻辱，但他表面不敢有丝毫流露，怕万一被吴王夫差看出来，脑袋就保不住了。就这样，他表面毕恭毕敬地服侍着吴王，不敢有半点疏忽，有些连最低贱的仆人都不会做的事，他也会去做，为的是迷惑吴王，让他以为自己

已经完完全全服从他的统治，已经没有丝毫的异心了。吴王夫差果然上了当，渐渐消除了对勾践的戒备，特别是一件事，让他对勾践连一丁点的防备都没有了。那是他病后初愈，勾践竟然亲口尝了他的大便，然后跪在地上向他祝贺：“恭喜吾王龙体康愈！臣刚才试过陛下的粪便。病人的粪便是甜的，而臣刚才却尝到了苦味，说明陛下龙体健康、龙威重振了！”吴王见他如此忠心耿耿，竟然也有点感动了，不顾臣子的再三劝阻，将勾践放了回去。这真是放虎归山。勾践回到会稽之后，念念不忘所受的耻辱，他雪耻的决心并不亚于当年夫差听到父王死讯时的心情。为了激励自己发奋图强，他在屋里悬了一只苦胆，每次吃饭时都要尝尝，而且睡觉时都是睡在柴草上。经过 10 年的苦心经营，越国又强大起来。公元前 482 年，越王趁吴王率精锐大军赴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与晋国争做霸主、国内空虚的机会，领兵攻打吴国，吴国的精壮兵力都被吴王带走了，那些老弱兵卒哪里打得过蓄养了 10 年的强敌？越王勾践不费什么功夫就大败吴军，并且杀死了吴国的太子。几年之后，又出兵灭掉了吴国，吴王夫差只得含恨自杀了。

司马迁来到当年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地方，深深地为勾践复国的坚强意志所感动，但同时也感叹历代各政权互相倾轧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各个统治者或是称王称霸，或是受尽挫折、暂时沦落，人民都是牺牲品，国强国亡，人民都是受到最差的待遇，都是受到统治者意志的支配。司马迁在当地搜集了许多春秋战国时期的史料，这对以后《史记》的著述有很大帮助。

会稽山上还有秦始皇当年立的石碑，司马迁找到了它，把碑文完完整整地抄录了下来，小心地保存好。这当然也成了他以后撰写秦始皇事迹的材料。

离开会稽山后，司马迁渡钱塘江北上，到了太湖附近的姑苏山。站在姑苏山上放眼望去，太湖波光粼粼，粼粼的波纹伸得很远、很远，湖中的岛屿星星一般点缀在湖面上，又似水中冒出的精灵，在湖面上戏耍。姑苏山是一座风景秀丽的名山，湖光山色，相映成趣。更吸引司马迁的，是这一带的湖泊。这一带湖泊众多，而且都连成了一片，这一壮丽的景观让司马迁赞叹不已，当然，无论怎样迷人的景色，怎样舒适的环境，都丝毫影响不了他搜集史料的严谨态度。姑苏山下曾经是吴国的都城，有名的战国四公子之一、楚国的春申君黄歇，就曾住在那里。春申君黄歇的故城和宫室仍在，历经了100多年的风风雨雨，它依旧那么雄伟，依旧透露出一种豪门贵族的华丽之气。司马迁到了春申君的故城宫室，将它们仔仔细细地看了个够，他不放过每一个角落，甚至花园中的草木，似乎要从这些建筑、这些旧物中，找寻春申君的影子。所谓“物在人亡”，睹物思人，司马迁也不禁感慨万千了。人的一生多么短暂啊，轰轰烈烈的一生、庸庸无为的一生，最终都要化成一抔黄土，回归自然。但是人死后又是多么的不一样啊，历史掩埋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有人流芳百世，有人遗臭万年，更多的人像那小草一样，默默地生、默默地亡，来去都没有在历史上留下点痕迹，就像一阵风，一阵轻轻的风，连小草也摇晃不起来。但是像春申君这样的人物，就是死去了一万年，也不会人们在记忆中消失，他们是大树、参

天大树，他们的根深深地扎进了土壤，历史的风雨只会让他们更苍翠、更挺拔，哪能摧倒他们呢？司马迁在春申君的故城里滞留了很长时间。

秦朝末年，项羽和他的叔父项梁，首先在姑苏山下高举反秦义旗，开始了秦末农民起义轰轰烈烈的一幕。司马迁当然不会错过对这些材料的收集。

司马迁在姑苏山一带停留了比较长的时间，这段时间里，他四处打听，收集到了许多有关吴王夫差、春申君黄歇以及项羽的材料，都把它们一一地记载了下来。

此后，司马迁渡江北上，首先来到了淮阴（今江苏淮阴市东南），这里曾是秦汉时期著名的军事家韩信的故乡和封侯之地。在这里，他听到了不少淮阴侯韩信的故事。韩信小时候家里很穷，连饭都吃不饱，他就经常到城外的淮河边钓鱼，钓着鱼了，一顿饭就有了着落。但钓到的时候不多，而且有时又有顽童捣乱，韩信常常饿得头昏眼花，在河边洗衣服的一个妇女见他可怜，就常常从自己的粗茶淡饭中匀出一些给他吃，韩信得到了这位贫妇的资助，才得以顽强地活了下来，后来他作了大官，仍念念不忘赠饭之恩。

韩信很小的时候就显出了过人的才华，因为家中一贫如洗，他不得不常在别人家中寄食，因而也经常被人欺侮，这一切都不影响他将干一番惊天动地大事业的雄心。据说他母亲死后，他把他母亲安葬在空旷的原野，众人很不理解，他解释说，这便于将来在这坟茔周围发展成一个繁盛的人丁兴旺的大城市。大家都笑他呆，没想到许多年后果然变成了现实。司马迁去韩母的墓地看了看，见坟墓果然像当地老百姓

描述的那样，他伫立在坟墓前，不由得对韩信的远见卓识产生了深深的佩服之心。韩信具有那么卓越的才华，那么过人的见识，一代英才怎么却遭到被斩杀的命运呢？萧何引荐他见到刘邦，从此他得到了充分发挥才华的机会，一步一步，为刘邦平定天下铺平了道路，一步一步，实现他宏伟的政治目标，这都离不开当初萧何的引荐，可是后来韩信却又死在他手里，这又是为什么呢？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里面又深藏了什么含义呢？难道真是世人说的那样——一切由天注定吗？司马迁认真地思索起来。他耳边似乎回响起楚汉战争中震天的战鼓声、呐喊声、戟矛相击声，他眼前似乎出现了韩信那充满傲气的神情，那在千军万马中游刃有余的身影。唉！人杰啊！司马迁想起了韩信的事迹：楚汉战争中，说服刘邦攻占了关中，为以后战胜项羽打下了关键性的基础；刘邦和项羽相持在荥阳、成皋时，又及时率兵出击，袭击项羽的后路，乱了项羽的阵脚，并破赵取齐，占领了黄河下游的广大地区；与刘邦围歼楚军于垓下（今安徽灵璧），使得楚霸王项羽自刎。“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这慷慨悲歌，与韩信的超人智略将一同载入史册！汉朝建立前后，先后被封为齐王、楚王；后势力越来越大，被人告发谋反，降为淮阴侯，封地淮阴；前197年，其同伙陈豨谋反事发，他也受到牵连，但碍于他势力强大并且在军民之中声望很高，刘邦不敢贸然下手，但也不甘心眼睁睁地看到韩信的羽翼越来越丰满，又哪肯让韩信依旧逍遥？表面上他不动声色，背地里却暗暗筹划着除掉韩信的打算。后来，吕后和萧何用计合谋将韩信骗到宫中，斩杀

了！并诛灭了韩氏三族。如此英才，竟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

司马迁得出了结论：韩信的命运掌握在他自己手里。他立下的业绩体现了他的才华，他的惨死体现了他做人不成功的一面：他自恃有才，狂妄自傲，得罪了不少人，而且野心很大，逐日膨胀，竟然想要谋反，这在那样一个忠君思想严重、君臣关系分明的朝代是万万不能容忍的，他聪明了一世，糊涂了一次，然而这一次的糊涂是再也挽不回的了。当然，历代统治者在霸业建成后诛杀功臣，特别是才华显露的功臣，也是常有的现象。

司马迁怀着种种复杂的心情离开了淮阴。

淮河与其支流泗水交汇的地方叫淮泗口，是古代天然的漕运要点。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等发起七国叛乱时，大将周亚夫坚守昌邑（今山东金乡），并派精锐兵力袭击淮泗口，断了叛军的粮草运输线，三个月后，终于打败了叛军。周亚夫是历史上的名将，他治军十分严谨，军纪森严，在军营中连皇帝都得遵守他的规定，被汉文帝称赞为真正的将才，他后来又辅佐汉景帝平定了七国之乱。司马迁对周亚夫并不陌生，当他渡淮河沿泗水北上，经过这个淮泗口时，一定会有许多感触。

从淮泗口沿着泗水再往北走，就到了山东曲阜、一代圣贤孔子的故乡。司马迁对孔子是十分仰慕的，曲阜也自然是他非常景仰的地方了。山东曲阜是古代的文化中心，历代都有不少知识分子到这里朝拜。司马迁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首先去参观了孔子墓。墓地很大，面积大概有一顷，各地来的人肃立在墓前，以各种形式表达他们对孔圣人虔诚的信仰，整

个墓地笼罩在一种庄严肃穆的氛围中，让人肃然起敬。司马迁专门跟董仲舒学过《春秋》，孔子的这一著述对他影响很大，甚至影响到他后来的创作方法，他对孔子，自然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在墓地附近，司马迁向当地人请教孔子的事情。人们告诉他，当年孔子死后，他的弟子替他守了三年孝，仍然不忍心离开这里，于是干脆搬到孔墓附近住，后来一些儒生也搬了来，渐渐有了几百家，人们把这里就叫做孔里。每年到了一定的时节，孔子墓前就挤满了前来祭祀的人群。人很多，但绝少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人人彬彬有礼，个个相互谦让。各地的儒生也经常到孔子的墓前演习饮酒和射箭等古礼，司马迁有没有亲眼见到儒生们讲习礼仪我们是不清楚的，但是司马迁一定特别想亲眼看看，那到是可以肯定的了。孔墓庄严肃穆的气氛深深地触动了司马迁。孔子，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公元前 551 年，孔子出生在鲁国的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名丘，字仲尼。他的父亲是个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在孔子三岁的时候，他就死了。不久，母亲带着他离开家乡，迁到鲁国的都城曲阜居住。母亲单薄的身躯独立支撑起了这个家，但无论她怎么没日没夜地操劳，她们母子仍然在穷困中挣扎，为了生活，孔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给人家干活，他当过牧童，做过吹鼓手和管畜牧的乘田、管帐的委吏一类的小官。他经常特别虚心地向人家请教各种本领，特别是请教祭礼时，连每个细节比如器具的摆设都要虚心地问个明明白白。渐渐地，他成了那一带学识最渊博的人。他的名气随着他才能、学识的增长而越来越大，但是一开始并没有受到鲁国统治者的重视。30 岁

左右，他开始从事教育活动。在当时，只有贵族的子弟才有受教育的权利，穷人家的孩子是没有地方上学读书的。孔子创办了私学，无论是谁、是什么样的出身，只要交一点象征性的学费就可以到他的私学去听他讲课。他教学生，学习要刻苦，要不耻下问，不能不懂装懂；学习要善于思考，如果一味地死记硬背书本上的知识，而不进行独立的思考，就会迷惘，如果只是空想连篇，而不学习知识，就会使精神困顿不安；……孔子还重视德才兼备的问题，他更多的是培养学生们良好的品德。他要求学生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要有坚强的意志，要有远大的志向等等。孔子很注重根据学生不同的特点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比如子路做事很鲁莽，孔子就教育他要经常进行周密的思考，做事要三思而后行；冉有的性格有点优柔寡断，孔子就鼓励他做事要果断，不要有太多的顾虑。孔子以身作则，用自己的言行影响着他的学生。他的声望越来越高，各地的人纷纷投到他的门下，连其他诸侯国的贵族子弟，也都来向他请教学问，据说他的学生总共有3000多人，其中有72个成了很有名的贤人。孔子50岁的时候，出任中都宰，后来又做过大司寇。56岁的时候离开鲁国，领着他的弟子周游列国，到处宣扬他的思想和主张，但是没有被各诸侯采纳。68岁时，他回到鲁国，开始致力于古籍的整理，编订了《诗经》、《尚书》、《易经》、《春秋》等，为我国古代历史文献的保存做出了巨大贡献。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孔子是我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学说后来成为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在中国的影响极为深远。

司马迁在孔墓附近徘徊了很长时间，然后来到了孔庙。孔

庙是孔子生前的居室和弟子们的住所，里面陈列着孔子的衣、冠、琴、车、书等遗物。司马迁很小的时候就读过孔子的书，对这一伟人十分仰慕，对孔子的家乡也非常向往，这次终于如愿以偿，来到了曲阜，而且还到了孔墓、孔庙，参观了孔子的种种遗物，这怎能不叫他心潮澎湃呢？他慢慢地在孔子的遗物前踱步，陷入了对孔子生前事迹的遐想之中。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孔子的事迹和思想，司马迁又到孔子生前曾住过的齐国都城临淄去访问，搜集到了大量的有关这位伟大思想家和教育家的材料。

带着丰厚的收获，司马迁继续为他的理想而奔波。

不久，他到了邹县。公元前 219 年，秦始皇登上邹县的峯山，在山顶刻石颂德，并且与鲁国的儒生们商量举行封禅大典的事宜。封禅大典是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的一种极为隆重的仪式。这种仪式，源于战国时代。“封”，就是要到泰山上筑坛祭天；“禅”，则是在泰山底下的小山上辟地祭地。帝王举行这种仪式后，才表明他是上天惟一的代表，是真正的真命天子，所以帝王们对这个典礼十分重视。秦始皇后来在泰山上举行了封礼，在梁父山上举行了禅礼，完成了封禅仪式。司马迁到了邹县后，自然也要去峯山考察一番，并且也向当地的儒士请教有关礼仪方面的事情。

由峯山向南，司马迁来到了战国四公子之一、齐国孟尝君田文的封地薛县（今山东滕县东南）。在这里他感受到了与曲阜一带很不相同的民风，曲阜民众深受孔子遗风的影响，重视礼节，温文尔雅，但薛城的民风却比较强悍，有不少暴戾的行为，让司马迁一时接受不了。司马迁不明白这其中的原

因，就向当地的老人们求教。老人们告诉他，很久很久以前，薛城的人不是这个样子的，大家相互之间相敬相亲，十分友好地相处，后来孟尝君十分好客，吸引了天下大批人士来投奔，来者不论是仁义之士，还是偷鸡摸狗之辈，孟尝君一概收下，有些做了坏事的人，也到他的门下逃避法令的惩罚，不法之徒投奔到薛县的竟有6万多户，这就使得当地的民风大变，成了现在这样。传说中的孟尝君好客自喜，果然名不虚传啊！老人们又向司马迁讲起了孟尝君的故事。司马迁后来把它们都写进了《史记》里。

一路的游历、一路的收获，司马迁收集史料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了，但是游资的日渐匮乏，已经成为了他继续游历、继续收集史料的障碍。怎么办呢？放弃继续游历的计划吗？可是他如何能舍弃得了这刚刚起步的事业，何况这事业已小有成效，不止一次地给过他鼓励；如果继续游历下去，又如何克服穷困呢？衣服破旧了，也该换换了；靴子磨破了底，也不能再穿了；明天的饭食，还没有着落，今夜，又将要到哪里去借宿呢？司马迁心里有些矛盾，为生活的窘迫踌躇不已。不！我不能放弃我的计划！司马迁心里一亮，挺直了胸膛。以前那么多困难我都克服下来了，难道还战胜不了这点困难吗？胸怀大志的司马迁忍受住饥饿，忘却了贫困，又大步向前走去。

不久，他到了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彭城是楚霸王项羽的都城，也是秦楚战争和楚汉战争的战场，历史上许多事件都与这个地方有着密切的联系。司马迁到这里后，马上投入到全面的搜集材料的工作中。他听说，项羽年轻的时候，不

爱读书习字，亲友们大伤脑筋，干脆送他去学习剑法，项羽也不好好地练，他的叔父项梁生气了，将他大骂一顿，项羽却说道：“读书习字，能写自己的名字就可以了；学剑只是为了防身，斗一两个人可以，与万人争斗就派不上用场了，也不值得学；我要学能抵御千军万马的本领！”项梁转怒为喜，认为项羽将来一定有大出息，于是亲自教项羽兵法，项羽一开始很感兴趣，学了个大概以后不肯再学了，项梁拿他也没有办法。他又听说，秦始皇游会稽山、渡浙江（即钱塘江）时，当地民众纷纷跑去观看秦始皇的容态，项羽和项梁也去了，当秦始皇的车马经过时，项羽对他叔父说：“我将要取而代之。”项梁吓得马上捂住他的嘴：“别胡说，这可是要招来灭族之祸的！”不过从此以后，项梁认定了项羽将来定有一番大作为，对他也更加器重起来。

司马迁很佩服项羽的勇猛之气，对他悲惨的结局也产生了深深的同情，同时他对项羽以莽夫之勇，想用武力平服天下，到临死的时候还不觉悟，提出批评。一个人勇猛异常，力气大得可以轻轻松松地举起大鼎，胆量壮得可以独自面对千军万马而面不变色，身体结实得像堵钢铁铸成的墙，但是缺乏谋略，做事不考虑后果，不进行妥善的筹划，又有什么用呢？这种人，只能算做豪杰，而不能坐位天下、治理四方。即使项羽从垓下突围出来了，即使他后来东山再起、神威再现，即使他胜了刘邦，天下自此姓项，又能维持得了几年呢？那很可能是秦始皇命运的重演。

彭城附近的郡县，也是历史材料异常丰富的地方。西北方向的沛县（今江苏沛县东）就是其中一个。曹参、周勃、樊

吟、夏侯婴的故乡就在这里。汉初的丞相曹参原来曾做过秦朝的小官；周勃足智多谋，辅佐汉文帝安定汉室，前面曾经提到过的周亚夫就是他儿子。这两个人物司马迁应该是很熟悉的了。樊哙是楚汉之争中有名的“鸿门宴”中的人物，他是卖狗肉出身，后来随刘邦四处征战，在鸿门宴上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当日鸿门宴上，庄公舞剑，意在沛公，刘邦的处境十分危急，樊哙听张良说了这个情况后，冲入军帐，守门的想要阻拦他，被他一下子撞到地上，半天爬不起来。他猛地掀开军帐的门帘，直对着项王站立着。他狠狠地瞪着项王，连眼眶都裂开了，头发也一根一根地竖了起来，项王被他吓了一跳，不由得双手按剑，对他十分警惕。相持了一会儿，项王忍不住问他：“你是什么人？”樊哙直瞪着看他，对他的话就好像没听见一样，旁边的张良回答道：“这是沛公的卫士，叫樊哙。”项王重新打量了一下他，不由得暗自佩服起他的胆量来，他朝四周扫视了一圈，指着樊哙对众人说：“这真是一位壮士啊！”然后命令侍从取酒给他吃，侍从取来了可以装一斗酒的大酒杯，冷笑着递给他，想让他当众出丑。樊哙接过酒杯，一口气将酒喝了个精光，然后轻蔑地将酒杯扔到地上，如同丢弃一块小纸片一样轻松，侍从吃了一惊，慌忙捡起地上的酒杯退下了。项王亦是爽快之人，他见樊哙如此豪爽英猛，又命令侍从取猪腿给他吃，侍从竟然将一只生猪腿送到他面前，刘邦、张良等都替樊哙捏了把汗。只见樊哙不慌不忙地取下身上的盾牌，放倒在地，将猪腿搁到盾上，用剑切了肉，大嚼起来，侍从看看面不改色的樊哙，又看看越来越小的猪腿，吓得面无血色，眼睛瞪得老大，嘴半

天都合拢不了。众人都对樊哙产生了钦佩之心，项王也被他的气势震慑了，他眼睁睁地看着樊哙吃完了生猪腿，又问樊哙：“壮士！你还能饮酒吗？”樊哙冷冷地回答：“我死都不怕，难道区区几杯酒就能吓跑我吗？”并义正词严地指责项王不守信用，当初和刘邦说好了，谁先攻破咸阳，谁就为王；现在刘邦不仅先攻下了咸阳，而且将咸阳保管得好好的，只待项王到来，准备将咸阳之功让给项王，项王却听信馋言，要加害于沛公刘邦，这同当年秦始皇残害无辜又有什么不同呢？项王被他说得答不上话来，后来只得由沛公一走了之。

夏侯婴呢，他原来给刘邦驾过车，后来被封为汝阴侯，人称“滕公”。

沛郡的丰县，是汉高祖刘邦的故乡，萧何也出生在这里。司马迁在这里，听到了不少有关汉高祖刘邦的事。当年萧何是丰县沛狱的主吏，经常资助刘邦。刘邦呢，年轻时无所事事，成天东游西荡，和一些屠夫、小贩子、花花恶少打得火热，经常和他们一起饮酒作乐，家里的事情根本不管，气得他父亲骂他是无赖，是败家子。后来刘邦当了泗水亭长，仍然恶习不改，而且好说大话、蔑视官吏，跟大家的关系闹得很僵，许多人都不屑于他的所做所为，但萧何仍然挺照顾他。刘邦到县里打官司，萧何都尽力替他开脱、袒护他；刘邦替沛县送民众去咸阳，县里的官吏按照惯例送点盘缠给他，萧何每次都比别人给得多。也许是萧何看出了刘邦内心的志向，知道他将要成就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所谓“十年不鸣，一鸣惊人”吧。公元前 209 年，陈胜、吴广首先发难，各地纷纷响应，刘邦见时机已到，于是杀了沛令，招集人马，迈出

了他宏伟大业的第一步。

许多事情，对于司马迁来说都是闻所未闻，他如饥似渴地收集着各方面的历史材料，楚汉之争的轮廓在他心目中逐渐清晰起来。

在丰县，他还听说有一个和刘邦同日生的，叫卢绾，少年的时候跟刘邦很要好，也帮了刘邦不少忙，后来刘邦对卢绾一直给予特殊照顾。

沛郡一带丰富的史料使司马迁振奋极了，他忘却了饥寒、忘却了困顿，一心一意地收集着各种史实。这一带历史人物的事迹经他整理、编写，成为后来《史记》中的最精采的部分。

带着巨大的收获，司马迁离开了沛郡，由沛郡向西南，经碭县（今安徽碭山南）到达睢阳（今河南商丘南）。他向当地父老乡亲了解到，当年在垓下领着 5 个人将项羽斩个稀烂的灌婴原本是睢阳的一个绸缎商人，后来跟随刘邦，屡立战功，被封为颖阴侯，他的后世子孙也享受着丰厚的朝廷俸禄。司马迁还直接寻访当年历史人物的后代，请他们畅谈祖宗的业绩。这其中历经了多少困难啊！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谁还能坚持下来呢？

漆黑的夜晚、漫漫的行程、寻访的艰辛，司马迁也曾有过对故乡的浓浓的思念，露宿荒野的时候，他会想起家中的温暖；饥肠辘辘的时候，他也会想起家里饭菜的香甜。可是路还得走下去，寻访还得继续下去。父亲的叮咛时常在耳边响起，对历史浓厚的兴趣鼓励着他克服一切困难去继续寻访。多少个漫长的夜啊，多少个黎明与黄昏，司马迁一步一步为

实现他的目标而奋进，在今天看来，这种精神也是难能可贵的。今天当我们捧着《史记》，感受着历史的风风雨雨、朝朝夕夕的时候，是否能感受到司马迁当时漫游大江南北时的艰辛呢？

司马迁在寻访历史古迹的时候，长安方面的消息也不断传来。此时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进一步削弱各诸侯的权力、限制土地兼并，已经紧锣密鼓地开始了他的计划。首先，他采用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允许各诸侯将他们的封地分给子孙，分得土地的诸侯子孙可以称侯。这样一来，诸侯的封地就分散了，权力自然也越来越小，对汉王朝的巩固也就构不成什么威胁了。汉武帝并不满足于这些，他想将诸侯的权力全部收归中央，于是以种种借口废除诸侯的权力，这样激起了不少诸侯王的反叛之心，但此时的诸侯王就好像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下子，哪里是汉武帝的对手？汉武帝三下五除二，将那些有异心的诸侯王全部摆平了。中央的权力巩固了，还有地方上的呢？汉武帝当然不会撒手不管了，又是派刺史，又是用酷吏的，把一些地方豪绅管得服服贴贴的。

司马迁在漫游途中，还不时听到歼灭匈奴的捷报。匈奴一度对西汉王朝构成很大威胁，汉高祖曾经被匈奴围困了几天几夜，到汉武帝之前，汉朝统治者对匈奴一直是采取妥协政策。汉武帝的时候，西汉国力已经相当强盛了，再也不愿受匈奴的控制，汉武帝任用大将卫青、霍去病领兵攻打匈奴，卫、霍骁勇善战，一路势如破竹，捷报频频。对于这样一件重大的事情，司马迁即使不在长安，也是可以知道的。

司马迁为汉王朝打击匈奴的不断胜利而感到自豪，汉王

朝被匈奴欺压了70多年啊！谁要想起来，都会觉得心情沉重，现在汉武帝派勇将把匈奴打得落花流水，又怎能不叫人扬眉吐气呢？但是战争又给边疆人民带来了多少灾难啊！匈奴人民也好，汉朝人民也好，总归都纷纷成了刀下之鬼；匈奴的土地也罢，汉朝的边疆也罢，总归都被践踏得一片狼藉，总归是死人不断，血流成河啊！司马迁的心情又沉重了起来。打了胜仗了，统治者眉开眼笑，统帅将领封爵加官；被人打败了，统治者气急败坏、三令五申地要报仇血恨，统帅将领面上无光、或被削职，或被处死，或是加紧练兵，以待将功赎罪，有谁又会想起那些无辜惨死的民众，那些血洒疆场的兵卒？多少人妻离子散，多少回家破人亡啊！司马迁善良的心隐隐作痛。可是历朝如此，历代如此，有谁能改变得了呢？司马迁摇摇头，发出了深深的叹息，再抬起头来时，已是满眶热泪。

可是司马迁也明白：社会本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整体，各种矛盾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解除得了的，人类社会就如同生存竞争的自然界，战争就像昆虫鸟兽的毒针爪牙，是自卫的工具，在一定条件下，暴力的存在也是合理的。“非兵不强，非德不冒”，国家要自强，战争是一种重要的手段，但只注重战争而不推行礼、义之德，国家也是不能繁荣昌盛的。这与儒家思想是有所悖离的。司马迁自幼受到父亲的影响，后来虽然学了不少儒学知识，吸收了不少儒家思想，特别是董仲舒解释的孔子的《春秋》，对他影响很大，但他并没有完完全全地接受儒家学说，父亲司马谈的黄老思想在耳濡目染之中，已深深地在他头脑中打下了烙印。

司马迁虽然同情战争中受到伤害的人民，但他也理智地认识到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战争也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对于那些侵略别人国土，掠夺他人财产，穷兵黩武的战争，司马迁是深恶痛绝的，而那些维护自己的利益、安全，那些反抗残暴无道统治的战争，以及那些有利于国家统一的战争，都是受到司马迁赞赏的。司马迁的这种思想观念，在当时来说已经是十分进步的了。

离开睢阳之后，司马迁继续西行，不久来到了魏国的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战国四公子之一、信陵君无忌的故事，在这里广为流传。

信陵君的为人、才识都是为司马迁所钦佩的，在战国四公子之中，司马迁最欣赏的就是信陵君了，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后来成了《史记》中尤为精彩的篇章。

信陵君为人礼贤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因而方圆数千里的人都纷纷投靠到他的门下，逐渐聚集了3000多人。各诸侯慑于信陵君的声威，10多年内都不敢对魏国用兵。

魏国有一个隐士，叫侯嬴，年过七十，家里十分贫穷，他本人是大梁夷门的守门者。夷门就是东门的意思，大梁夷门的旧址还依然存在呢。信陵君听到这个消息后，爱才之心顿起，连忙带着丰厚的礼物去夷门看望他，侯嬴不接受厚礼，他说道：“我修身养性、洁身自好已经几十年了，哪能因为守门，家里贫困就接受公子您的东西呢？”信陵君没有强求他，反而更加佩服他的人品。回到府中后，信陵君置办酒席，大宴宾客，等到宾客们都到齐、入席了，信陵君套上马车，空出左

边的座位，径自去夷门接侯嬴去了。古时候以左为尊，信陵君空出左边的座位给侯嬴，自然是将侯嬴的地位抬得比自己还高了。到了夷门后，信陵君请侯嬴上车，侯嬴整了整衣冠竟毫不客气地坐到了信陵君的位置上，并且态度傲慢，他想以此来试探一下信陵君的反应，但他看到的只是信陵君更加谦虚恭敬的态度。车子没走一会儿，侯嬴又提出来要去看看他的一个杀猪的名叫朱亥的朋友，信陵君二话没说，赶着车带着侯嬴穿过闹市，到了朱亥的家里。侯嬴故意磨磨蹭蹭地跟朱亥唠叨个没完，并且悄悄地观察信陵君的态度，信陵君温和地站在一旁，脸上没有一丝不耐烦的表情。信陵君的侍从却气坏了，暗暗咒骂着侯嬴，这也难怪，侯嬴也太傲慢无礼了，要知道信陵君家里还有满堂宾客呢，且堂堂一魏国公子，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给这么一个穷老汉驾车，太没有脸面了。侯嬴在朱亥那里又磨蹭了一会儿，见信陵君态度始终那么恭敬，也不好再拖延了，于是别了朱亥，到了信陵君家。信陵君请侯嬴坐上座，然后在宾客面前对侯嬴大加赞扬，一个貌不出众的老头居然受到如此礼遇，宾客们都很吃惊。后来，信陵君又亲自给侯嬴敬酒，祝侯嬴身体健康。侯嬴终于被深深地感动了。他后来成了信陵君的上客。

侯嬴告诉信陵君，他的朋友朱亥也是个有本事的人，只是世人不知道罢了。于是信陵君也经常去拜访朱亥。

后来秦国攻打赵国，将赵国的都城邯郸团团围住，赵国的处境十分危急。魏国和赵国一直很友好，秦王担心魏国会派兵援赵，于是恐吓魏王说：“我很快就会攻下赵国了，各诸侯中谁要敢管闲事、来救赵国，我攻下赵国后就马上派兵攻

打他的国家！”魏王吓坏了，他本来已经派了 10 万大军去解救赵国，这一来，马上派人通知统帅晋鄙停止前进，晋鄙接到命令后驻军不前，名义上是去解救赵国的危机，实际上已经名不副实了。信陵君的姐姐是赵国平原君的夫人，赵国危在旦夕，信陵君岂能见死不救？他请求魏王发兵，但是魏王惧怕秦国，他费了不少口舌、举了许许多多的理由都没能说服魏王，见发兵无望，信陵君横下心来，带领他的宾客约百余人去救赵国，想与赵国同归于尽。

一行人个个抱了必死之心，气氛十分悲壮，经过夷门时，信陵君将他的打算告诉了侯嬴，并向侯嬴诀别。侯嬴只说了一句：“公子您好自为之吧！恕我不能跟随您同往。”信陵君驰马走了一段后，想起刚才侯嬴的态度，不禁有点不大高兴，他心想：“我平时待他不薄，各方面的礼数都尽到了，这是众所周知的。我现在将要去与秦国拼命，他却没有什么表示，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我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吗？”想到这里，他马上拉转马头，回到夷门。侯嬴微微一笑，说：“我料到你会回来的。”不待信陵君开口，他又接着说：“公子您喜欢结交天下朋友，闻名四方。现在碰到了困难，不想想别的办法就想去与秦军作战，这如同将肉送到饿虎的嘴里，又有什么功劳可言？这样能救得了赵国吗？公子您平时待我十分周到，现在您将去赴死，我却没有什么言辞，我知道您一定会因为记着这件事而返回来的。”信陵君一听，惭愧极了，连忙拜倒在地，向侯嬴请教计策。侯嬴告诉他，晋鄙的兵符收在魏王的卧室里，只要偷出了兵符，就能夺得晋鄙的兵权，解救赵国就不成问题了。至于怎样才能把兵符从魏王那里偷出来，

就得靠如姬了。如姬是魏王的宠妃，能经常出入魏王的卧室。当年如姬的父亲被人杀害后，她到处找人替她报仇，三年时间过去了，还没有查出凶手的下落。她对公子哭诉了这件事，公子马上派宾客查出了凶手，并斩下了凶手的头送给如姬，如姬对此感激涕零，公子要是求她什么事，她肯定是不会推辞的。信陵君一听，豁然开朗，马上去求如姬取兵符，如姬一见报恩的机会来了，想办法偷了兵符给他。

信陵君收好了兵符，整装待发，侯嬴又说，“将在外，主令有所不受。公子的兵符即使与晋鄙带在身边的兵符合上了，但是晋鄙不把兵权交给公子，却要向魏王请示，事情就危险了，我的朋友朱亥力大无比，您可以将他带去，要是晋鄙不交兵权，您可以叫朱亥将他杀了。”古时候将帅领兵在外作战，都带着兵符的一半，另一半在皇帝那里，皇帝要是想下达什么命令，就派人拿了那一半兵符去，两半兵符合上之后，就如同皇帝亲临，将帅这才会执行皇帝的命令。但是情况特殊时，将帅也可以拒绝执行命令。信陵君接受了侯嬴的主意，但是一想到晋鄙作为一名骁勇的老将，将要被击杀，不免有些于心不忍，但除此之外无别的办法可以解救赵国的危难。信陵君于是请来了朱亥与他同行。信陵君该走了，他去向侯嬴道别，侯嬴说道：“我老了，不能跟您一起去救赵国。我将计算公子的行程，等公子到了晋鄙军中之后，我就面向北方自杀，以此来送公子。”

晋鄙果然对兵符有怀疑，不肯交兵，朱亥从袖中抽出40斤重的铁锥，将他杀了。信陵君取得了统帅权，挑选了8万精兵，攻击秦国军队，秦军来不及防，很快就被打退了，邯

邯郸解围了，赵国得到了保存。信陵君自知惹怒了魏王，干脆不回去了，就在赵国住了下来，他带领的魏国军队呢，则委派一名将领带了回去。

司马迁专门去当年的夷门看了看，遥想往事，不禁感慨万千。信陵君的礼贤下士、大仁大义，侯嬴、朱亥的知恩图报、耿耿忠心，无一不在头脑中显现。黄河水滚滚向东流去，沉淀下了多少泥沙；在历史的长河中，千古风流人物都化做了尘埃，是随浪而去了呢，还是沉在了河底？信陵君的学识才华、潇洒英姿、高尚人品，我可以从当地人的言谈中领略得出来，这样一个人中灵杰，我却不能一睹其之风采，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情啊！这样的人才不知多少年才能出一个呢！现在像这样大仁大义、礼贤下士的有德之士可是越来越不多见了。

司马迁在大梁又听说了不少有关信陵君的事。这么多年过去了，信陵君在当地百姓心目中仍然具有很高的地位，他的一言一行，就像昨天才发生一样，依然活灵活现地存在于老百姓的头脑中，百姓们每每谈起，总是满脸向往，满脸虔诚。司马迁深深感受到了这一点，对信陵君也就更加钦佩了。

从大梁向西，经过洛阳、函谷关，司马迁就再也没去别的地方了，直接回到了长安。

长安啊！远方的游子回来了！几年的风风雨雨、几年的艰辛跋涉、几年的酸甜苦辣、几年的坎坎坷坷，此刻都化作了滚滚热泪。京师长安依旧那么繁华，街道上依旧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此起彼伏的叫卖声依旧那么响亮，这一切都还是原来的模样，我的老父亲呢？他现在还好吗？司马迁一想到

父亲，马上加快了步伐，大步朝家的方向走去。

司马迁的这次漫游，是一次前无古人的壮举。历时数年，他的足迹遍及了大江南北。多少艰难困苦，他都忍受过来了，多少日升日落、朝朝暮暮，他都走过来了，这需要多么强大的毅力的支持啊！许多人也有宏伟的志向、有准备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的决心，当谈论这些志向时，他们口若悬河，显得多么意气风发、令人敬畏啊！可是现实生活中的一点点挫折、一点点风浪，就会将他们宏伟的志向、干大事业的决心击得粉碎。与这些人相比较起来，与那些成天为鸡毛蒜皮的事斤斤计较，伤透脑筋的人比较起来，司马迁是多么的人来人往伟大，他的精神是多么地难能可贵啊！

带着搜集史料的目的去游历祖国的河山，司马迁一定会有另外一番感受。欣赏着祖国壮丽的山色，他想的更多的是当年的历史事件在哪里发生、历史人物在哪里留下音容笑貌、在哪里叱咤风云。观汨罗江，屈原的事迹让他感伤不已、痛哭流涕；上九嶷山，棵棵斑竹引起他对远古的驰骋想象；登会稽山，深幽的“禹穴”让他对治水平患的大禹产生仰慕；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立志复国的决心让他钦佩；战国四公子的故地之游，让他对这四位英杰有了更清晰的印象；淮阴、彭城、沛县等地的游览，秀丽的景色丝毫挡不住他对收集楚汉相争中历史材料的兴趣；曲阜之行，又让他对孔子这一中国历史上的伟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鲁地孔子遗风在民众中的影响也让他感叹不已；……青山绿水、滚滚江河，在别人眼里是各具特色的景观，司马迁把它们看作是历史人物上演各种历史悲喜剧的舞台。当然，他也曾为宜人秀美的景色所陶

醉，他也不止一次一回地赞叹祖国山河的壮丽、多姿多彩。

司马迁的这次漫游，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传说、历史资料，为他以后写《史记》这一历时达 3000 多年的巨著准备了一定的条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彭城、沛县一带的收获，对他以后在《史记》中评价楚汉战争，评价汉初统治者具有很大影响。

## 第三章 漫漫仕途

### 一、入 仕

远游归来的司马迁，不久就步入仕途，做了一名郎中。

郎中是汉代官吏中很小的一个官，主要职务是看守宫门，皇帝出行时就担任皇帝车驾的侍从，保护皇帝的安全。官虽然很小，不足挂齿，但可以借职务之便经常接近皇上，算得上是皇帝的亲信，这倒是令许多人向往。

汉朝的时候要成为郎中，一般来说有两种来源。元朔五年（公元前 124 年）以前，只要是父亲的官职俸禄在二千石以上的，就可以被选送去做郎中，因此富贵家的子弟成为郎中里的主要部分，平民和芝麻小官的子弟都是没有机会作郎中的。董仲舒后来就这件事在《贤良对策》里表示异议，因为高官家的子弟未必都是德才兼备的优秀分子，相反，许多富贵人家的子弟都是玩物丧志，花天酒地的庸俗之辈，皇帝天天跟这些人在一起，接受这些人所谓的保驾，又有什么安全可言呢？京城官俸在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并不少，哪能担保他们的子弟个个人才出众，个个都能胜任保护皇帝的重任呢？

皇帝一听到这涉及自己安危的问题，就有些坐不住了，后来公孙弘出了一个主意，18岁以上的优秀青年，可以补博士弟子员，朝廷每年给出50个博士弟子员的名额给民间，这些挑选出来的50个博士弟子员经过每年一度的考试，成绩优秀的，就可以做郎中了。因此到司马迁的时候，就有两种途径去做郎中。他父亲司马谈的官职并不高，只有六百石的官俸，这离二千石的标准还差得远呢，通过前一种途径是没有希望的，司马迁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获得作郎中的机会。

司马迁童年时受到他父亲严格的教育，10岁时就可以流利地诵读《国语》、《尚书》之类的古文，到长安之后又向儒学大师董仲舒、古文大师孔安国求教学问，他的学识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来越广博，越来越受到当地人民的赞赏，20多岁就游遍了大江南北，其丰富的阅历、远大的志向、渊博的学识是一般人无法相比的。在这种情况下，他顺利地成为了博士弟子员。

离郎中的职位不远了，司马迁不敢怠慢，更加认认真真地学习。从古到今的历史文献，他几乎读了个遍，天文、地理、历史、医学、文学，他无一不精通。他并不完全是为了当一名郎中才如此刻苦钻研的，他更看重的是自身学识的补充和能力的培养，这不能说没有为将来整编历史资料做准备的企图。

但是毕竟离郎中还有距离，亲友们劝司马父子去拜访拜访达官贵人，特别是要去拜访一下主持选拔郎中事务的要员，司马父子笑着领受了亲友们的好意，但是去拜访的事宜父子俩谁都没有再提起，那类事情是所有光明磊落的人都不会去

做的，何况司马父子呢？司马迁要凭自己的能力去开创一番事业，凭自己的学识去争取郎中的职位。果然，他不费什么力气就通过了考试，成了一名郎中。从此，司马迁走上了政治道路。

官虽小，事情却还不少，那些高官人家的子弟很瞧不起他们这一批通过考试选拔上来的郎中，自认为高他们一等，平时总是对他们冷嘲热讽，指指点点，好像是这些平民子弟的介入抢了他们的饭碗，污染了这皇宫富丽堂皇的门庭，却忘了他们自己卑劣的德性才是对皇宫门庭最大的污染。司马迁他们忍受着这一切，他们干的活，是最苦最累的，除了整天笔挺挺地站着守宫门不算，休息的时候还得受富家子弟使唤，给他们打扫卫生，给他们端茶送水，甚至还得捶腰捶腿，像个奴仆一般，司马迁他们能反抗吗？那些贵族子弟的后台哪个不是高官厚禄，要给司马迁他们使坏也不过是一两句话的问题。但是司马迁却又是与一般的平民子弟不同的，想想看，那么漫长的日日夜夜都留在了大江南北，那么多的艰难困苦都忍受过来了，司马迁他还会在乎目前这点苦这点累吗？但是人格上的侮辱有时却叫他无法忍受，那些富贵少年故意刁难他、用难听的话侮辱他，他也针锋相对地反唇相讥，用愤怒的表情表示对他们的不满，这样一来，他们反而不敢再随便招惹他了。渐渐地，司马迁的才能显露了出来，他与众不同的气质、彬彬有礼的谈吐，高人一等的才华，让其他人相形见绌，望尘莫及，那些平民子弟纷纷以他为榜样，把他当作最知心的朋友，亲密地与他交谈，诚恳地向他请教，富家少年也渐渐摒弃了高傲的态度，一改过去的狂妄自大、目中

无人的态度，对司马迁敬重起来。尤其当他们听说司马迁只身游历了大江南北的事后，更加钦佩司马迁的为人了。他们邀司马迁去参加他们的聚会，空余时间跟他们一块去游耍，但是司马迁都一一谢绝了，他要用有限的空余时间，整理他在漫游途中收集到的资料，他还要查阅大量的历史文献，印证一些历史事件，哪有功夫去游玩呢？一次、两次，那些富家少年见他总不肯去，不禁有些恼怒了，以为他太不识抬举，后来也就不怎么请他，渐渐地也就冷落他了。对于这些，司马迁仍然不放在心上，所谓荣辱不惊，这些小插曲在司马迁的心灵里荡不出什么波澜。

作为皇帝的侍从，当皇帝四处巡游的时候当然也得跟着。皇帝走到哪里，他就得跟到哪里。汉武帝一向喜欢到各地巡游，跟随皇帝跋山涉水，并不是什么很好玩的事，稍不小心，就会掉了脑袋，但是司马迁对此却很感兴趣，他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去考察更多的地方、收集更多的资料了，从心底说，他巴不得天天有这样的机会呢！

汉武帝对祭祀天地的事情，是十分感兴趣的，在司马迁作郎中以前，他就出巡过好几次，专门去进行祭典活动。公元前 133 年，汉武帝第一次出巡到雍（雍在长安以西扶风的地方），祭祀上古时代的颛顼、鲧、尧、舜、禹五位贤明的君主。颛顼、鲧、尧、舜、禹这五帝大多是传说中的人物，他们的事迹带有极为浓厚的神话色彩，常常与神啊鬼啊妖啊怪的纠缠在一起，让人分不清哪些是真，哪些是假，这正好也使得他们在人们心目中神秘莫测起来。他们能通神、能统领各类神怪，人们心目中的五帝是无所不能、大贤大德的圣人，

这也从侧面代表了人们的一种理想吧！汉武帝此次祭祀五帝，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抬高自己。五帝是人们心目中的圣君，汉武帝对五帝的虔诚态度，是希望臣民把他与五帝联系起来的——“我这么年轻有为，英明无比，威震四海，难道不值得人们像赞颂五帝一样赞颂我吗？刘家王朝的统治一天天地巩固，这难道不是我的功劳吗？这难道不可以跟当年五帝的功业相媲美吗？”当然，这种想法他是不会公然讲述出来的，他要在臣民心目中树立一个谦虚的、尊重上古圣人的形象。同时，他也想通过祭祀祈求五帝帮助自己去进一步完成各项大业：北方匈奴仍是汉朝边境最大的威胁。就在这一年，他用了王恢的计策，派了30万大军埋伏在雁门关外，然后派少数兵力去将匈奴引入埋伏，然后一网打尽，倒是想得挺周到的，不料却被匈奴识破了，30万大军一个匈奴没逮着，垂头丧气地回来了，把汉武帝气得够呛，马上命令左右将王恢推出去斩了！匈奴不平定，汉武帝岂能安心？还有地方上土地兼并严重，民怨纷纷，这也是亟待去解决的问题；有几个诸侯不大听话，虽然几年前废了济川王刘明，其他那些看上去仍旧不怎么恭顺，得好好整治整治；……大大小小的事加起来，够汉武帝伤脑筋的了，因而祭祀五帝，祈求圣灵的帮助，这是可以理解的。

此次祭祀以后，汉武帝忙于攻打匈奴、巩固边防和打击诸侯的势力、集中中央的权力，10多年内都没顾得上再出巡去举行祭祀天地的活动。

公元前122年，汉武帝再次出巡到雍，又将五帝祭祀了一番。此时各诸侯王已被他剪除得差不多了，派到各地的刺

史也已将地方势力控制得服服贴贴，平定匈奴也卓有成效了。卫青、霍去病这两员勇将把匈奴赶得东奔西跑，打得落花流水，匈奴单于的叔祖父都被霍去病轻易斩去了脑袋，匈奴臣服有望，汉朝可望彻底解除边境的威胁了！汉武帝这次祭祀五帝，心情一定与上次大不相同，得意之心，溢于言表。第二年，汉武帝不知什么原因又到雍祭祀五帝。可见他祭祀天地的兴趣是越来越浓厚了。

公元前 113 年，汉武帝开始巡游郡县，司马迁首次随皇帝出巡，他的父亲也在其中。武帝照例先去雍祭了五帝，然后转向东北，经过夏阳到了河东。河东郡（今山西夏县北）太守没料到皇帝会来，仓促之中哪来得及准备呢？接待皇帝可不是随随便便的事，弄不好触了龙威，问罪下来，个人死了是小事，九族被诛灭可就惨了，太守越想越急，越急越怕，干脆自杀了。这并不影响汉武帝巡游的兴致。他在汾阴立了后土祠，举行了祭礼，一切仪式都是由太史公司马谈和祠官宽舒商定的。仪式结束后，汉武帝渡过了黄河，从荥阳（今河南荥泽县西南）返回长安。经过洛阳时，汉武帝下诏赏赐 30 里地给周天子的后代，让他们用以祭祀周天子。周天子就是周朝的天子、皇帝，他灭掉了商朝，建立起了统一的国家。他采取分封制，把原来属于商朝及其所属国的领地都分给灭商中有功劳的亲族或部落，当时周武王威震四海，各部落无不俯首称臣，人称周天子。分得领地的部落或亲族就叫做诸侯，周武王的时候，慑于天子的权威，各诸侯都乖乖地服从天子的统治，按时献上贡品钱物，后来随着周天子势力的减弱，周室王朝的衰落，各诸侯就再也不甘心受周室王朝的控制了；他

们纷纷拥兵自立，称王称霸，而且彼此间争斗不断，构成了混乱的春秋战国时代的主题。而周天子的后代呢，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到周朝末期的时候，各诸侯已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而且还随便侮辱周天子，抢周天子的东西，周室王朝的威严一落千丈，再也不能统管神州四方了！想当年，周天子具有何等的声望啊！周室王朝虽然一去不复返了，周氏后代也逐渐不为人所知了，但周天子的四海之尊的威望在人们心目中仍具有很强的印象，他的英勇、他的贤明、他的才识，许多年来仍受到人们的敬仰。汉武帝此次赏赐周氏后代地 30 里，也许是出于一种对没落的周氏后代的怜惜吧！

第二年，即公元前 112 年，司马迁再次随汉武帝出巡。汉武帝又到雍去行祭祀，这次祭的是五畤。五畤就是青黄赤白黑五帝的祭地。一番繁琐的祭祀仪式之后，汉武帝继续西行，越过陇坂（山名，在今陕西陇县、甘肃清水县境内），到了陇西郡。陇西郡的太守只听说皇上去雍祭五畤，没料到皇上忽然有了兴趣要来这里，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上下乱成一团，眼见得皇上已到陇西郡了，而自己还没做好迎接圣驾的准备，一急之下，也自杀了。他已不是第一个因为来不及迎接突如其来的皇帝而自杀的太守了。汉武帝西登空桐山（即崆峒山，在今甘肃平凉县西），据说黄帝也曾经到过这座山，司马迁跟随皇帝到了这里，自然又搜集到了许多有关黄帝的传说。当然作为皇帝的侍从，皇帝巡游的时候，他是不敢乱动乱问的，但是陪同皇帝到了这些古地，他也是有机会能亲眼见一见的，空闲的时候，也可以找当地的人请教一下。皇帝每到一处，当地大官小吏都得候着，司马迁职位固然很低，但是作为一名

皇帝的亲随，那些地方官也是不敢小觑的，司马迁要向他们请教点什么，他们还不得搜肠刮肚地讲给他听？有时候，他抽个空离开皇上到老百姓家里去，也能从老百姓那里收集到不少传闻。当然，一身戎装是不能进老百姓的家门的，那只会吓着了他们，家里平白无故地来了一个全副披挂的人，任何平民百姓都会猜疑、都会畏惧的，哪还会讲什么传闻给他听？司马迁每次都是换上便装再去拜访他们的。

汉武帝登上崆峒山之后，又北出萧关（今甘肃固原县东南），率领数万骑打猎于新泰中（今内蒙古河套一带），然后回到了甘泉。司马迁这次跟随皇帝出游，收获颇丰，尤其是熟悉了不少祭祀方面的礼仪知识，他对这次出游，是有很深的印象的。

## 二、奉使蜀滇

司马迁多次跟随汉武帝出游，他敏捷的思维、丰富的学识、良好的修养、巧妙的问答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汉武帝称他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博学多识，善于文辞的人物之一。在公元前 111 年，即崆峒之行的第二年，汉武帝派司马迁出使巴蜀以南，代表西汉政府去视察和安抚西南各少数民族。

还是在公元前 135 年左右，汉武帝就想控制南越（今广东广西一带）地区，番阳令唐蒙向汉武帝建议说：“想要征服南越，如果沿着长沙、豫章（今江西南昌市）的水路运兵运粮，就太麻烦了，不仅路途曲折遥远，水路漫长，而且北方士兵多半不精通水性，很容易出差错，不如从夜郎（今贵州

西部)过了牂牁江(今盘江),给南越来个突袭,打它个措手不及。”汉武帝一听这主意不错,不仅可以征服南越,路途中还可以将夜郎一并收服,可谓一举两得。于是就任命唐蒙为中郎将,让他率领巴蜀千人前往夜郎。唐蒙到了巴蜀后,除了按照皇帝的命令征集了千员巴蜀民众之外,又发动民众一万多人替军队转运粮草,胆敢抗拒者皆以军法论处,一下子弄得巴蜀地区鸡犬不宁,民怨纷纷。汉武帝惟恐激起民变,连忙派司马相如去安抚巴蜀的民众。司马相如是蜀籍人,西汉著名的辞赋家,政治上并不得意,后来汉武帝欣赏他的文采,封他为郎官,这次他就是以郎官的身份去安抚巴蜀民众的。到了蜀地以后,他做了《喻巴蜀檄》、《难蜀父老》等文章,阐述与西南少数民族通好的重大意义,并向巴蜀民众解释说,把巴蜀地区弄得鸡犬不宁绝不是汉武帝的本意,唐蒙对巴蜀民众所犯下的过错都与汉武帝无关。这一来,民心就安定多了,同时,司马相如也以君臣之礼来告诫巴蜀民众不要有反抗之心,唐蒙兴师动众固不对,民众们又是埋怨又是逃跑的,这也是有悖于君臣之礼的。

唐蒙呢,早领了兵力毫发不损地到夜郎去了。夜郎在汉朝的时候还只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势力弱小,唐蒙到那以后,不费什么口舌就说服了夜郎国的首领多同归顺汉朝。后来汉武帝就在夜郎建立了犍为郡,这就是现在的四川宜宾。到公元前130年的时候,汉武帝征发了大量巴蜀民力修筑了从犍为郡治所僰道到牂牁江的通道,这样就直接对南越构成了威胁。这条通道附近有不少少数民族部落建立的国家,他们见西汉王朝如此神威,而自己势单力薄,被汉朝收服不过是早

几天晚几天的事，螳螂之臂，岂敢挡车？还不如主动归服算了，一来免得动了干戈，自己部落吃亏，二来还可以得到丰厚的赏赐，夜郎国的臣服就是先例。于是，邛（今四川西昌县内）、笮（今四川汉源县内）、冉駹（今四川茂汶县内）等地的首领纷纷表示愿意服从汉朝的统治，并请求汉朝马上派官吏去进行治理。汉武帝一听很得意：这分明是我大汉王朝的声威慑服了他们、我汉武帝的贤明感化了他们啊！各邻近小国纷纷俯首称臣，我大汉王朝威望无比啊！不久，他任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前往这些地区（统称西夷）播撒大汉王朝的恩泽。司马相如和副使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坐着马车很快就到了西夷。西夷各国首领臣服之心是早就有了的，因而很快与汉使达成了协议，正式归顺汉朝。司马相如回朝复命后，汉武帝在西夷设立了一个都尉，下属 10 多个县，统统隶属于蜀郡。

许多年过去了，西南各民族相安无事，一切太平，各部落都规规矩矩地听从汉朝的治理，不敢有什么异心。汉武帝忙于应付匈奴，也无暇顾及西南地区的事物。但是到了公元前 112 年，汉武帝突然调集兵力，以杨仆、路博德为将，大举讨伐南越诸地。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汉武帝不是还在跟匈奴周旋吗？怎么会抽出兵力来对付南越呢！这其中的原委还得慢慢道来：当年汉武帝收服夜郎，是想以夜郎为跳板征服南越，因而加紧筑路，加强了以夜郎到牂牁江的联系，在无意间得到大批少数民族部落的臣服后，不禁十分高兴，减缓了对南越的用兵，加上北方边境没有安定，匈奴的威胁仍是汉武帝的一块心病，汉武帝为了全力对付匈奴，就把征服南

越之事暂时搁到了一边。南越呢？在汉武帝派兵进入夜郎的时候，尚不知觉自身的危险，当从夜郎到牂牁江的通道筑好以后，南越王有些惶惶不安了，朝中上下也是一片混乱，主张求和的也有，主张反击的也有，大多数还是倾向于向汉朝妥协，想想看，区区南越一块小地方，哪里是大汉王朝的对手？当邛、笮、冉駹等地的少数民族部落纷纷对汉朝称臣的时候，南越王再也坐不住了，眼见得夜郎诸地已在汉朝的控制之下，汉军在夜郎诸地屯集，灭南越之势已成，南越王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主动臣服吧，南越有富饶的资源、强大的军队（当然是相对于其他小国而言）、强悍的将士，更重要的是有许多天然的屏障，在军事上不是没有优势，这么乖乖地就成了汉朝的臣民，颇有些不大甘心；不臣服吧，汉朝军队充足的兵力、富强的国力，岂是南越能抗衡得了的。南越统治集团内部意见纷纷，最后决定先观望一阵，要是汉朝军队不是冲着南越来的呢？要是汉朝军队到时候又撤走了呢？他们抱着侥幸心理，观望着、等待着，果然不久有消息传来，说是汉朝已放松了对西夷的控制，大批兵力也调回去了。南越王终于松了一口气，但是从此以后，南越对汉朝的态度恭顺了许多，倒也相安无事。但是公元前 112 这一年，南越内部起了叛乱，丞相吕嘉杀死了南越王赵兴及王太后，并且还杀死了汉使终军，公然蔑视汉朝，这可惹火了汉武帝，他马上派了大批人马前往征讨。第二年，破了南越的都城番禺（今广东广州），很快又逮住了吕嘉，将他斩首。汉武帝见南越已破，于是在南越地区设了南海、苍梧等郡，后来干脆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统一了领导机构，建立了牂牁郡、越巂郡、沈

犁郡、汶山郡、武都郡五郡。这些地区的局势稳定以后，为了进一步巩固汉朝对这五郡地区的统治，汉武帝派了司马迁去进行视察和安抚工作。

这就是司马迁出使蜀滇地区的背景。

司马迁此次出使的具体经历已经没有详细记载了，但是他对西南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方面的记载，却详细得很，对后代人研究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起到重要作用，他的巨著《史记》中的《西南夷列传》，多为后世人所借鉴。唐代大作家柳宗元的《游黄溪记》和《袁家渴记》就是仿照这篇《西南夷列传》而作的。

我们考证司马迁此次游历的路线，大概是南出汉中，然后经巴郡、蜀郡到沈犁郡，再到越雋郡，最远到了昆明。巴郡、蜀郡这些地方在汉朝的控制下，各方面都起了变化，朝着进步的方向发展。汉朝先进文化的传入对这些地区的影响很大，西南人民从汉族人民那里学到了不少工艺技术：汉人陶瓷、制绢、制玉等工艺让西南人民叹为观止。其实何止当时的西南人民呢？现代的人们不也常为汉朝文物中那精湛的工艺品，那惟妙惟肖的雕刻、绘画，那精美绝伦的绢帛等等而感叹不已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时的帛画、绢衣，河北满城出土的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的金缕玉衣等等，哪一样不使得现代人眼花缭乱？当然，交流总是相互的，汉族人民自然也吸取了不少西南人民的长处。司马迁出使到这里的时候，应当感受到的是秩序井然的景象。让我们想想看吧！西南地区既然同其他地区一样是汉朝的臣民了，各民族、各地区间的交往肯定是日益频繁，各种装束的人们操着不同的语

言共同繁荣着整个西南地区，使得西南诸地各方面的发展有了很大的提高。对于这一切，司马迁应当是感到很欣慰的了，当然，这也是一个收集西南各地政治文化、风土人情的机会，司马迁自然是不会错过的。

然后，司马迁往云南昆明地区进发。

还是在博望侯张骞出使大夏国的时候，大夏国的集市上就有巴蜀的布匹、邛地的竹杖等物品流通，张骞十分奇怪，要知道大夏国距汉朝有一万多里，路途那么遥远且不畅通，西南地区的物品怎么能在大夏国出现呢？于是他向大夏国的人请教，人们告诉他，大夏国的东南方向有一个身毒国，这些物品就是大夏国的人历经数千里的路程，从身毒国那里弄来的。张骞更奇怪了，忙追问身毒国的情况，大夏国的人将所知道的见闻都原原本本地讲给他听：身毒国在靠近大海的地方，那里的气候湿热，风俗大体上跟大夏国差不多。那里的人以大象为坐骑，连作战的时候都是坐在大象上打的。张骞对此感到很振奋，他想，大夏国和汉朝的交往一向有道路上的阻隔，汉朝使者出使到大夏国，要经过匈奴的地带或者是羌人的国土，障碍重重，匈奴一向与汉朝为敌，羌地又十分险要，且对汉使不友好。现在既然有这么一个身毒国，联系着大夏国和蜀地，那么从蜀、邛等西南地区越起身毒国就可以到大夏国了，多便利啊！他回去以后把这一情况禀报了汉武帝，汉武帝于是派了使者从西南地区出发，前往身毒国。一行人到达云南昆明以后，遇上了当地的土匪，钱财被抢了，命也丢了，最终没能打通从西夷到达大夏国的道路。

司马迁出使蜀滇的时候，云南一带还没有归顺汉朝，对

汉使依旧没什么好感，司马迁一路的艰辛可想而知。他在云南可能并没有停留多久，历史上也只有他曾经到过昆明的记载，但沿途留下有关他的传说却不少。比如《云南通志》中就说司马迁曾经到过西洱河，“汉元封间，郎中司马迁到此观西洱河”；《滇云历年传》中记载：“司马迁立讲堂于叶榆（大理），为滇云讲学之始。”说是司马迁不仅到过大理，而且还在那里设堂讲学，开滇云讲学之风，如此等等。

公元前110年冬，司马迁完成出使任务，离开了蜀滇地区，去向汉武帝复命。

司马迁的这次出使，不仅对加强汉朝跟蜀滇地区的联系、保持彼此间的友好关系起到了重大作用，而且对他补充上次漫游中收集到的资料的不足、观察蜀滇各地的民俗民风大有帮助。到现在为止，司马迁几乎已经将全国游了一个遍，尤其是中国东南、西北、中原和西南各地的风俗文化、历史传说，司马迁都已经相当熟悉了。

### 三、扈从封禅

西南地区各部落纷纷臣服汉朝，北方匈奴之势已日落西山，“文景之治”的繁荣景象依旧在延续，疆域的扩大、政治的稳定、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广泛传播，这一切都使得汉武帝的封禅大礼的即将举行成为必然。

有关封禅的情况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这是一种极为隆重的祭祀天地的仪式，封禅仪式之后，就表明自己是受命于天的至尊，因而这种仪式历来为各朝皇帝所重视。“封”和

“禘”是两种不同的祭祀方法，在泰山顶上筑坛祭天，就叫做“封”，在泰山底下的小山上辟地祭地，就叫做“禘”。汉高祖时，因为汉朝初建，政局还不稳定，匈奴又不时骚扰边境，汉高祖刘邦忙于诛杀功臣，忙于与匈奴周旋、妥协，没功夫考虑行封禘大礼的问题，而文帝、景帝为人仁厚、体谅民众，也不愿劳师动众，到泰山去行封禘大礼，况且文帝、景帝时期，黄老思想占主导，这两位贤帝对封禘之事也并不怎么重视。但是到了武帝就不一样了，武帝好讲排场，好歌功颂德，祭祀天地的事他很少间断，况且现在国力强盛、政局稳定、边疆安宁，怎么能忽略封禘这一大礼呢？

公元前116年夏六月，汾水附近挖出了一个巨大的鼎，上面雕刻着各种花纹，还有一些怪异的文字，当地太守把这个消息报了上去，汉武帝对此大鼎的出现颇有些奇怪，找了挖掘者来查问，见并无奸诈，于是用隆重的仪式把大鼎抬到了甘泉。汉武帝亲自将大鼎察看了一遍，对大鼎宏伟的构造、怪异的花纹图案、神秘莫测的文字暗暗称奇，以为这是一个神物，于是想把这个鼎运到长安去，运输途中出现了怪异现象，有黄云浮在鼎的上空，一种叫做麋的珍稀动物麋从鼎旁穿过，汉武帝亲自射下了麋，用来祭黄云。自此，这个大鼎在汉武帝及群臣心中更加神秘了。到长安之后，朝中上下对它更是议论纷纷，均认为这是一个宝鼎，是汉武帝的贤德惊动了上天，才使得这个“符瑞”出现。大臣们纷纷对汉武帝歌功颂德，劝汉武帝马上祭祀天地，举行封禘大礼。司马相如临死的时候都还对封禘之事念念不忘，在遗书中“颂功德、言符瑞”，劝汉武帝封禘。

在大臣们的不断怂恿下，汉武帝举行封禅大典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了。他命令儒生们筹备封禅的事宜，准备封禅。

皇帝封禅，事关重大，儒生们哪敢草率，又是查古书，又是引用古制的，各抒己见，几年过去了，也没弄出个头绪来。汉武帝干脆自己制造了一套封禅祠器给儒生们看，儒生们又说同古代的不一样，不能用于封禅大典，汉武帝大为恼怒，“尽罢诸儒不用”。后来儿宽建议说：“享荐之义，不著于经，……唯圣主所由，制定其当，非群之所能列。”于是汉武帝就自己制定了封禅礼仪。

礼仪既然制定妥当了，封禅的事就该一步一步来实行了。按照古制，封禅先要罢兵，汉武帝于是率领十余万大军，招展了千余里的旌旗，浩浩荡荡地越过长城，到了五原、归绥，在边境耀武扬威，把匈奴震慑了一番。然后到了陕西的中部县，在桥山祭祀黄帝。传说中的黄帝坟墓就在桥山，汉武帝问左右：“黄帝不是成仙了吗？怎么会有坟墓呢？”臣子们答道：“黄帝已经成仙上天了，这里葬的是他的衣冠。”汉武帝对成仙的向往顿时又添几分。

随后，这一行人马东下，东巡海上，礼拜嵩山，然后东上泰山，去正式封禅。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作为太史令，本来是一直跟随着汉武帝的这次巡行的，不料到了洛阳以后病倒了，被留在了洛阳。眼见得千载难逢的封禅盛典参加不了了，司马谈又气又急，病势加重了，这时，司马迁刚好从西南回来，准备去向汉武帝复命，路过洛阳时，见到了生命垂危的父亲。司马迁几乎认不出他的父亲来了！那么瘦骨嶙峋，那么颓废无神，往

日踌躇满志的神情哪里去了，往日循循善诱的慈父怎么变了一个人？司马谈见到儿子，眼里有了些光彩，他拉着儿子的手，悲愤交加，禁不住落下泪来，他断断续续地对司马迁说：“我的祖先是周王室的太史，在远古的虞舜、夏禹时期就取得了显赫的功名，掌管天官的事务。后来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中断，直到我做了太史令，继承了这一世业，现在难道这世业要断绝在我手里吗？如果你做了太史，就能延续我们远祖的世业了。如今天子接续千年的传统，要去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我作为一名太史令，却因病不能跟随前往，去亲自参与这举足轻重千载难逢的盛典，这是命运吧！这是命运啊！我死之后，你必然会接替我做太史。做了太史之后，千万不要忘了我所要编写的著作。况且，孝顺是从侍奉父母双亲开始的，然后在做事、在为皇帝效命的过程中得以体现，但这一切都是为了使自己能够在社会上立足，使自己扬名后世，以使父母得到显耀，这才是最大的孝啊！天下的人都称颂周公，说他能记述、颂扬周文王、周武王的贤德，宣扬、推广周公、召公的风化，实现周太王、王季的理想，以及公刘的主张，使周室社稷受到尊崇。周幽王、周厉王残暴无道，王道亏缺，礼乐教化之事逐渐衰落，后来孔子修治、复兴了王道，并且编了《诗》、《书》，著写了《春秋》，为历代人所借鉴，当今的学者还以此为准则。孔子死后，自从鲁哀公猎获麒麟以来，已经有400多年了！这400年间，诸侯互相兼并，时局纷乱，社会动荡不安，历史的记载从此中断了！如今汉朝兴盛，海内统一，明主贤君、忠臣义士，多少该载入史册的人物啊！我作为太史令却没有对他们进行记载，废弃了历史的事业，对

此我于心不安，十分恐惶，你要记住这件事啊！”司马迁早已泣不成声，他含悲答应：“儿子我虽然愚笨、缺乏才能学识，但我一定会尽力把父亲您所整理的历史见闻全部论述完毕，不敢有一点缺漏。”司马谈心里总算有了一点安慰，他望着业已成人的儿子，怀着种种遗恨，离开了人世。

司马迁抚尸大哭，慈父的故去让他痛不欲生。慈父的音容笑貌，慈父的谆谆训导，从此只能在记忆中出现了！他司马迁从此是没了父亲的人了。儿时与父亲在夏阳耕牧，享受了父亲多少的疼爱啊；稍大后在父亲的督促下学习古文，父亲的严格要求现在还记得清；到长安后师从董仲舒、孔安国，父亲的鼓励、诱导给了他多少信心和勇气啊！大江南北漫游的时候，父亲的殷殷嘱托何尝又不是常在耳边响起；出使蜀滇之前，父亲对他的衣食住行，对他此行的安危，关怀备至，叮嘱再三，那些言语给了他出使途中多少暖意？……都不在了！都不在了！这些都将永远成为记忆，也只能成为记忆了！遥想往事，想起父亲的生平为人，司马迁这个历经了多少艰难困苦坎坷挫折都不掉眼泪的人，竟哭成了泪人，弄得邻居们心里都酸酸的，相识的、不相识的，纷纷过来劝慰司马迁。过了一段时间，司马迁的心情终于渐渐平复下来，他想起自己此次出使蜀滇还没去向汉武帝复命，不敢多耽搁，于是妥善安排了父亲的后事，匆匆赶往泰山去见汉武帝。

汉武帝到了泰山以后并没有马上举行封禅大典，他听说蓬莱岛上有神仙出现，忙迫不及待地派了好几千人去蓬莱求仙，自己随即也跟了去。司马迁这时应该已经见到了汉武帝，并且作为汉武帝的侍从，也应该跟随汉武帝经历了这次求仙

之行。

忍着丧父之痛，司马迁陪着求仙心切的汉武帝向蓬莱岛进发。途中，前面派去的人传消息过来，说他们晚上见到了一个巨人，有几丈高，出现了一会儿就不见了，天亮以后去巨人出现的地方查看，发现有巨人留下的足迹，有点类似于动物的脚印，只是要大得多而已。大臣中又有人说，看见一老头牵着一只狗，嘴里不停地：“我要见巨公，我要见巨公。”也是一眨眼就没了踪影。很难说汉武帝就全然相信这些，但他求仙之心一日不灭，这些所谓的见闻就一日不绝，这倒是可以断言的。

怀着强烈的求仙愿望，汉武帝在方士们的指引下，到处巡行、祭祀，地方去了不少，希望破灭了，方士也杀了不少，但汉武帝的求仙之心丝毫不见减弱，仍兴致勃勃地在司马迁等的陪同下跋山涉水，寻访神仙的踪迹。

漫游也好，出使也罢，即使随帝求仙，司马迁每到一地总是忘不了熟悉当地的地理位置、地形，了解当地的奇闻轶事，搜集有用的历史资料。这成了他精神上的主要目标。至于此次陪汉武帝到处求仙、祭祀，与其说他虔诚地相信这一套哄人的把戏，还不如说他是把这当成他的职责，因为他是郎中，他的职责就是侍奉皇帝，皇帝要祭祀，皇帝要求仙，他就得陪着、侍候着。缭绕香火中，浓浓的宗教气氛下，他想的更多的还是如何完成父亲的遗愿，继《春秋》而著述。

夏四月，汉武帝率众臣回到奉高（今山东泰安东北），准备正式行封禅大礼。封禅礼仪是汉武帝早就亲自制定了的，但封禅典礼具体应当如何举行，众儒生和方士们又各抒己见，意

见难以统一，又一次让汉武帝恼火，于是他干脆又一次抛开儒生与方士们的意见，自己钦定具体的操作办法。

汉武帝首先到泰山南面的梁父山上，辟地祭地，举行了“禅”礼；然后到泰山东麓，用祭祀太一（上帝）的形式，筑坛祭天，举行了“封”礼。“封”、“禅”仪式结束后，汉武帝觉得还不够尽兴，还没显示出泱泱大国的气概和他汉武帝的无量功德，于是携了大将霍去病的儿子霍嬭前往泰山之巅，举行第二次“封”礼。这次仪式的整个过程是非常隐秘的，司马迁作为汉武帝的亲随，也未必得以亲眼一见。不过这也是无法考证的了。汉武帝带着霍嬭在泰山顶上呆到第二天才下山，随后又到泰山东北方向的小山肃然山上，参照祭祀后土的仪式，举行了第二次“禅”礼。封禅仪式到此就算告一段落了。

古代皇帝举行重大祭典活动时，总是担心天公不作美，如果天不遂人意，皇帝就会有德行修养不够的嫌疑，当年秦始皇在泰山封禅的时候，遇到了暴风雨，仪式不得不草草了事，儒生博士们在背后都讥笑他不配举行这种封禅大典。汉武帝此次封禅，风和日丽，很是让他得意：“我的德行无量啊！否则天怎么会这么助我呢？我的功绩盖天啊！否则怎么连统一了全中国的秦始皇都比不过我呢？”群臣对他的赞誉之声更是不绝于耳。在这个时候，头脑清醒的人是很少的，不管受捧者也好，捧人者也罢，头脑里早被各种吹捧之词塞得满满的了。但是头脑清醒的人总还是有的，司马迁就是一个。

司马迁是不信鬼神的，什么封禅、方士、鬼神，对他来说都是骗人的，那不过是方士们为了生存编出来的哄人的把

戏。比如说，有一方士名叫少翁，自称可以通神，汉武帝按照他的意思建了甘泉宫，中间设台，祭天神，一年多了，甘泉宫除了人声还是人声，除了人影还是人影，哪有半点神仙的痕迹？后来少翁又写了帛书给牛吃，然后骗汉武帝说牛肚子里有宝贝，汉武帝命人将牛杀了，从牛腹中取出帛书，初见时大喜，还以为真是得到了宝物，仔细一认那字迹，却发现是少翁的笔迹。汉武帝的心情可想而知，堂堂天子，竟然受人愚弄，岂不气极，诛杀少翁是情理中的事，但是少翁是死了，更多的方士还活得好好的呢，他们照旧绞尽脑汁、搜肠刮肚想出各种主意各种说法来满足汉武帝的精神需求——求拜神仙，长生不老。司马迁对这一切都是看得很清楚的，对这类荒诞不经的事，他是很厌恶，很反感的，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求仙再荒唐，他也得跟着，封禅再愚昧，他也得参与，谁叫他是皇帝的侍从呢？这都是他的职责啊！当一个人天天做着他所反感的事情，见到他所反感的事物时，心里必然是很难受的，加之刚死了慈父，司马迁那时的心情该是多么沉重多么压抑啊！幸好，他可以借此机会游历祖国河山，收集、整理历史资料，倾听各种历史传闻，为著述历史继续做准备，惟有此，他心里才得到一点安慰，得到一点解脱。

封禅过后，在方士们的鼓动下，汉武帝又起驾到了海上，希望见到仙人。世上本无神仙鬼怪，纵使方士们吹得天花乱坠，纵使汉武帝东南西北跑断了腿，仙人依旧只是一个概念而已，哪能看得见、摸得着？汉武帝这次注定又是白费功夫，但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使他还没来得及失望就暂时放弃了海上求仙之事，那就霍嫪的暴死。汉武帝很扫兴，遂没了继续海

上之行的兴趣，只得快快地沿海北上，至碣石（今河北昌黎县北），巡辽西（今辽宁义县），历北边（北部边陲），至九泉（今内蒙包头市西），然后返回甘泉。此次北地之游，历程一万八千多里，汉武帝一路挥霍无度，给沿途郡县的赏赐无以数记，十分丰厚，这都是老百姓的血汗啊！皇帝却毫不吝惜地用于挥霍，用于赏赐，以显示皇恩浩荡，恩泽各地。所经之地，哪一处不是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哪一处不是搅得鸡犬不宁、民心惶惶？这一路一万八千里，人民的苦难又何止一万八千里啊！司马迁对此十分痛惜，但是作为一名小小的郎官，他又有什么办法呢？

司马迁的这次北地之游，弥补了他对塞外边境材料的不足，至此，他的足迹几乎已经遍及了祖国的山山水水、沟沟坎坎。这难道仅仅是历史的巧合？历史不甘于几百年的沉默、孤寂，它要寻找代言人；司马家族不甘于世业中断，它要给司马子孙赋以历史的使命；西汉王朝到了汉武帝时已天下大定，局势平稳，它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汉武帝生性爱热闹，喜欢四处巡游，这又是一个重要的条件，而司马迁偏偏又做了侍奉皇帝的郎官。……20岁时开始了大江南北的漫游，揭开了他游历祖国各地的序幕，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侍从汉武帝从南到北，从西到东，收获颇丰；奉使蜀滇，又使他对西南地区各方面的情况有了更深的了解。这一切一切，都为他以后论著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游历并没有结束。

## 四、负薪塞河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滔滔黄河，给人多少感慨、多少向往，又多少迷茫？人们常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生长的摇篮，是中华民族的母亲，这母亲的性情又多么令人难以把握啊！高兴时，她一路欢歌，愉快地向人们展示她的丰姿，慷慨地给它两旁的良田沟渠以甘甜的乳汁，哺育它们的生长，人们从她那里得到了生存发展的力量和希望；发怒时，浊浪滔天，呼啸着、喘息着、呐喊着，铺天盖地摧残着树木良田、恐吓着她的儿女们，其狰狞的面目，苍天也为之变色。人们的力量在这位发怒的母亲面前，显得是那么弱小，那么单薄。黄河之水的每一次泛滥，夺去多少无辜生命，破坏多少美丽家园，人们流离失所，无处容身，灾难何其重，痛苦何其深！

但是人们是不甘屈服的，一次又一次的灾难之后，人们再也不愿忍受了，他们要奋起抗争，要与洪水搏斗，这宣言里孕含了多少悲壮，又有多少沧桑！人们的声音被滚滚涛声盖住了，人们的力量一次又一次被排排浊浪摧垮了，但是人们的意志也一次又一次地得到了增强。

大禹治水十三年，疏九川、洒九泽，终于平定了水患，人们对黄河再也不是无能为力了。人们揣摩着黄河的习性，修水渠，建河堤，化弊为利，引黄河之水灌溉农田，形成沃野片片，但黄河又岂肯甘于摆弄？黄河的威力又岂是能忽视的？她反抗，她要摆脱桎梏，她又一次次发泄她的冲天怨气，但

人们再也不惧怕她了，堤垮了，再修起来；渠断了，再接起来；亲人死了，掩埋起来；家园毁了，重建起来！历史就在这样的抗争中前进着，人们就在这样的抗争中成熟着。

从远古时代起，治理黄河就是历朝统治者的必然政务，尧舜时，先后派鲧、禹治水；春秋战国时，西门豹治水，秦国修郑国渠；西汉汉文帝时，巩固河堤，补漏补缺，到了汉武帝时又怎样呢？

公元前 132 年，黄河在濮阳瓠子决了口，滔滔河水，势不可挡，向东南方向注入巨野（今山东巨野县），一路毁坏农田民居无数，人们苦不堪言，又一次饱受苦难。肆虐的黄河水经过巨野后流入了淮泗，对十六郡都产生了巨大的破坏作用。汉武帝派了汲黯、郑当率领十万民夫去堵塞决口，然而黄河之水来势凶猛，将堵好的决口又一次次冲垮，决了堵，堵了又决，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却也没将决处堵住，人们都已经疲惫不堪了。汲黯、郑当遂将实情上告汉武帝，丞相田蚡向汉武帝建议说：“黄河决口，这是上天的意志决定的，现在派了大批民众去强塞决口，不是逆了天意吗？就是堵塞住了，违背了天的意志，又有什么好处呢？”劝汉武帝放弃塞河之事，顺其自然，汉武帝正一心忙于对付匈奴，听田蚡这么一说，也就不去管瓠子口的塞河工程了。这一来，这个地区的民众就遭了殃，水患不断，年成歉收，衣食住行全无保障，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初丞相田蚡的一番道理，天命倒是顺应了，可人命呢？谁来拯救这多灾多难的人民？要是田蚡的封地在这个地区，他还会满口天命、天道吗？只怕早就磕头作揖地求汉武帝增援了，就是因为他的封地在离河

水泛滥区很远的郟地（今山东平原县西南），不仅毫发无损，反而收成颇丰，他哪会替灾区的民众想想呢？

二十多年过去了，瓠子口一带饱受黄河之水的摧残，人烟寥寥，坟茔遍地，鸦声不断，一片凄惨景象，但人们仍在坚持不懈地抗争着，决口堵了又决，决了再堵，为了生存，为了后代子孙的命运，瓠子口边演出了一幕感天动地的悲壮之剧。

平定匈奴之后的汉武帝忙于四处祭神求仙，寻找长生不老之法，忙于兴师动众，泰山封禅，几乎把这一带的灾情给遗忘了。直到他巡祭山川，为封禅大典做准备时，才想起这件事来，为了不影响封禅时国泰民安的气象，营造一个人民安居乐业、五谷丰登的景象，他派了汲仁、郭昌征发数万民夫赶往瓠子口塞河，民心重新大振，塞河现场又是一番热火朝天的景象。祭完泰山之后，汉武帝亲临濮阳的塞河工地，先是祭河，“沉白马玉璧于河”，然后命令将军以下的官员都去负薪塞河，司马迁自然也是其中之一。

塞河不是说塞就能塞得住的，几捆柴草、几担土石，转眼就会被冲得无影无踪，后来人们想了办法，先在决口处一排一排地打下竹桩，然后在竹桩之间填上土石和柴草。土石和柴草自然要填得多，填得快，否则又会被激流冲走，几万民众奔走于大堤上，景象十分壮观。文武百官混于民众之间，情愿的、不情愿的，都在为塞河而奔走着。

司马迁自幼耕牧，后来又奔波于东西南北，背几捆柴草，对他来说又算得了什么？比起那些养尊处优的官员来，他干起这活要轻松多了。他感受着这一场人与自然搏斗的壮观景

象，内心汹涌澎湃，思绪纷纷：自然力是强大的，然而人民的力量更强大！自古以来，人们为这黄河流下了多少血泪，洒下了多少汗水，可是总不能够彻底治愈水患，到什么时候，人们才能免受这水灾之苦呢？但愿这一次能堵牢了这个决口，让遭难了 20 多年的濮阳人民多过几年安宁日子吧！心里这样想着，脚下的步子愈发加快起来。柴草一捆一捆地从他的背上送到决口，他的激情也一点一点地在膨胀，几乎忘却了一切疲惫、饥寒，只知道一刻不停地为这一伟大的工程奉献着他微薄的力量。

然而柴草并不是能源源不断地供应的，时值春天，当地民众又要烧柴草取火，因而柴草很缺乏，塞河工程进行得很艰难。汉武帝担心这一次塞河不成，于是作了“瓠子之歌”以抒悲壮之情：

瓠子决兮将奈何，  
皓皓旰旰兮閭殫为河！  
殫为河兮地不得宁，  
功无已时兮吾山平。  
吾山平兮巨野溢。  
鱼沸郁兮柏冬日。  
延道驰兮离离常流，  
蛟龙骋兮方远游。  
归旧川兮神哉沛，  
不封禅兮安知外！  
为我谓河伯兮何不仁，  
泛滥不止兮愁吾人？

啮桑浮兮淮、泗满，  
久不反兮水维缓。

河汤汤兮激潺湲，  
北渡污兮浚流难。  
攀长茝兮沉美玉，  
河伯许兮薪不属。  
薪不属兮卫人罪，  
烧萧条兮噫乎何以御水！  
颓林竹兮榘石淄。  
宣房塞兮万福来。

数万民众、文武百官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将为害多年的瓠子口堵住了！整个工地一片欢腾，人们为就要脱离苦海而欢呼不已，司马迁欣喜的泪水也夺眶而出，慈父去世之后，他沉重的心情第一次得到舒放，他再一次品尝到了劳动之后的甘甜、生活的甘甜。

决口堵住之后，汉武帝在大堤上修建了宣房宫，以纪念这次塞河工程，此后 80 多年内，这一带再也没闹过水灾了。

司马迁对这次塞河工程是感触很深的，汉武帝的《瓠子之歌》也让他深受感动，他想起自己在祖国各地领略到的湖光山色，考察过的水利工程，不禁十分感叹水利建设的重要性。后来他作了《河渠书》来纪念这次塞河之事。

## 五、太史令

公元前 108 年，也就是司马谈死后的第三年，司马迁做

了太史令，应了他父亲的遗言。从此，司马迁开始了论著历史这一伟大的工程。

太史令在西汉时与州刺史、县令等是一个级别的，享受六百石的官俸，实际月俸七十斛。在西汉王朝庞大的官府机构中，太史令的职位自然是很低的了，名义上相比郎中是有所提升，实际上等于从皇帝的近臣降到了普通下级官员的位置，反而是不如郎中的，但司马迁已经很满足了，他觉得自己能担任太史令，一方面是父亲的缘故（父亲也曾是太史令），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汉武帝对自己的信任。不是吗？太史令官职虽小，但也不是说谁想当就能当的，除了记录史实，整理古代文献古籍，太史令还得负责阴阳吉凶的占卜、天文星象的观测，这可不是一个普通人能胜任得了的。司马迁受父亲的影响，对这一切知识早就烂熟于心了，可以说他在成为史官之前，就已经是一名合格的史官了。

司马迁得到这个职位后，更加兢兢业业地工作着，他一心想着要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全部智慧，投入到这个职位中去，希望能有所作为，像他父亲临死时嘱托的那样，“以显双亲”。不仅如此，他还劝他的好友挚峻、长安的一名隐士也出来做官，但是被挚峻婉言谢绝了。

司马迁之所以以这样大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太史令这个职位的本身。前面说过太史令的一项重要职责是整理古代文献古籍，司马迁当了太史令以后，得以进入石室金匱（国家藏书的地方）阅读、整理各种历史文献，这对于他来说是再好不过了。原来收集的历史资料毕竟是零散、不完整的，缺少一个整体的轮廓，就像一个人的躯体缺

少骨骼和经脉一样，各部分之间缺乏应有的联系，因此司马迁早就向往着有朝一日能参阅历朝历代的文书古籍，国家藏书处中极为丰富的藏书，无疑让他如鱼得水，从此他尽情畅游于这些古籍之中，几乎忘了一切身外之事。

石室金匱中的藏书真多啊！但又仅仅是多而已，由于缺乏管理，各种藏书随便堆积在一起，没有一点秩序，十分杂乱，而且许多竹简（古代在纸未发明之前，都是将字刻在竹简上，然后用牛皮绳把竹简一片一片地连起来。有时候写一篇文章，其所用竹简要用牛车拖才行）都损坏了，串竹简的牛皮绳也断了许多，零散残破的竹简到处都是，有些地方甚至成了老鼠们的乐园。司马迁对这一切是很痛惜的，除了重新整理，已没有别的办法。他仔细地一片一片地阅读、归类、整理、登记，有时为了一片破残的竹简，他得花上几天几夜的工夫去推断其已损坏的内容，态度十分严谨。日子就在考证、校对之中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司马迁忘了白天，忘了黑夜，只是全心全意地整理着、整理着，石室金匱成了他的家，竹简为友，竹简为枕，竹简为案，司马迁头脑里满是竹简，满是竹简上的列列文字，别的东西对于他来说，都已经不再重要了，他几乎忘了他还有一个家，忘了家中的大小事务，与亲友之间的交往、应酬，也逐渐断绝了。什么叫废寝忘食？司马迁比废寝忘食还要废寝忘食得多啊！

万籁俱静时，藏书处的司马迁仍在忙碌不息，东方未晓时，司马迁又早已竹简在握，伏案疾书了。多少个日日夜夜啊，司马迁躬身简中，“为伊消得人憔悴”，身体本来就不怎么健壮的司马迁，显得更加瘦削了，但那双眼睛，却依旧闪

烁着刚毅的光采，尤其当他发现了某种新的宝贵资料时，那双眼睛就更加明亮了，灼灼神采，似乎能将它穿个透。

有时，他也到藏书室外面的走廊上散散步，透透气，活动一下倦怠的筋骨，感受一下大自然的气息，“又是好久没回家了！”司马迁掰着指头想算一下到底有多久没离开过书室了，一个指头还未掰下去，却已是满脸苦笑：他连今天是什么日子都不记得了！无奈地摇摇头，只得又往前走。

阳光柔柔地洒在屋檐上，又顺着屋檐倾斜下来，将几株翠竹的影子送入了司马迁的视线，司马迁抬头望去，高出墙头的竹枝在阳光中随着微风轻轻拂动，似乎一位淡泊红尘的世外高人在品味人生，是甜？是苦？是辣？是酸？在高人的眼里，都不过是一道风景罢了，只是景色各异而已。几只不知名的鸟儿，啾啾叫着从司马迁的视野中飞走了，留给了司马迁整片的天空，任他思绪驰骋。天空中飘着几簇懒懒的云朵，淡灰色的，和那浅蓝的天空一样不怎么明澄，太阳看上去并不耀眼，用不着把手搭在额头上去看它的姿采，它正慢慢地向西边滑去，身后跟着一群云朵，云朵的边缘被太阳的余辉染成了绯红，如同系了一圈美丽的丝带，终于，这丝带越来越红，越来越艳，终于将整个云层燃烧了！司马迁的心底莫名地激动起来，有一种赋诗颂词的欲望，可这欲望在脑海只闪了一下，转眼就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甸甸的使命感，书室成堆成捆的藏书在召唤他，父亲的遗命在鞭策着他，时间有限，历史浩瀚，他得在有限的时间内整理出浩瀚的历史，为继《春秋》而著述做准备。时候不早了！司马迁舒了口气，慢慢地踱回了书室。身后，已是红霞满天，太

阳和云彩做了最后一次对视之后，慢慢地没入大地，只有余辉仍在天空眷恋，渐渐地，它也累了，它也褪去华衣，在已经发灰的天空中睡着了。

书室并非世外桃源，纵然这里在司马迁看来也是书香扑鼻，充满情趣。身为太史令，司马迁是脱不开俗务的，他得向汉武帝禀报书籍整理的进度，他得抽时间记录朝廷内外发生的大事，他得掌管阴阳吉凶的占卜，他得负责天文星象的观测，六百石的俸禄不是好拿的啊！论著历史是他的理想，也是父亲的遗愿，可是阴阳占卜星象观测之类的事也是他的必要工作，为此，他常常不得不忍痛放下心爱的古书，去做这些事情，到底他自己信不信这些呢？我们现在都无从说起了，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更要命的，是他还得经常陪汉武帝去四处巡游、祭祀，作为西汉时的太史令，这也是他的本职工作。历史上记载着，从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到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汉武帝频频外出巡游祭祀，达到十次之多，历经今宁夏、河北、山西、江西、湖北、安徽、山东等诸多的地方，或是游玩，或是祭祀，或是巡视，或是封禅，总之让司马迁不能安心地去钻研他的古书。但这又何尝不是一次考察名山名川，丰富史料的机会，司马迁对此倒感到了几许欣慰，这样一边整理古书，一边出来印证古书上的记述，不是更好吗？或许还会有许多新的发现呢。司马迁有些安心了。

但是巡游是按照汉武帝的意志前进的，去哪里，去干什么，都是汉武帝一句话的问题，巡祭天地诸神是汉武帝的目的，因而去的，都是些与祭祀有关的地方，行的，也是些祠

后土、修封泰山、郊泰畤、祠五畤之类的事，烟火缭绕的神坛让汉武帝及其侍臣陶醉，却让司马迁有点不耐烦，那一屋的古书还等着他呢！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为人之臣，就得失去自己行动的自由，就得看人脸色，听人使唤，全国上下都得听他支使，看他脸色，何止他司马迁一个人呢？

抛开这些祭神活动，司马迁倒是也有点时间考察一下民风民俗，收集一点史料的。在这一连串巡祭活动之中，也不是没有使他印象深刻、受益颇深的事情：

元封四年（公元前 107 年），司马迁扈从北巡。这一年的冬十月，他随汉武帝在雍祭了五畤之后，沿着中道，北出萧关（在今宁夏固原县东南），一路到了独鹿山（今河北涿县西）、鸣泽（今河北涿县西）、自代（今河北蔚县西南）等地后返回，后来又到了河东郡（今山西夏县东北）。

还有一次是元封五年冬（公元前 106 年），司马迁扈从南巡。这一次他们先到了盛唐（在今庐江），又去九嶷山祭过了虞舜，然后登上灊天柱山（今安徽潜山县西北，当时号称南嶽，在山上留连了一番之后，从寻阳（今湖北黄梅县西南）沿水路到了枞阳（今安徽桐城县东南），一路帆樯林立，船舳相接，繁华之中透出几许威严，让沿途的地方官员诚惶诚恐，百姓也是纷纷驻足观望。汉武帝站立在船头，如潮的“万岁”之声涌来让他很是心醉，布置得富丽堂皇的江岸让他很为自己的业绩得意，若不是自己这么兢兢业业，体谅爱民，臣民们能过上这么富足的生活吗？地方上能拿出这么多华丽的绸缎、鲜美的果点、艳丽的鲜花吗？这都是我汉武帝治理有方啊！得意之色溢满了汉武帝的面容，众臣也是一片歌功颂德之声，司

马迁心里暗暗为这些地方的民众叫苦，龙船过后，他们不知又要为此受到多少盘剥，伪饰的繁华，让地方官吏出尽了风头，可这都是以对民众更重的剥削为前提的啊！苦，百姓苦；亡，百姓亡！

这两次的随帝巡游，涉足广泛，对他丰富史料，熟悉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是很有帮助的。

整理古书的工作就在断断续续中持续着，渐渐地，各方面的古籍都理出了个眉目，司马迁正待进一步进行钻研，又有一项重大的任务落到了他头上——修改历法。

西汉自建立以来，一直沿用的是秦朝时候的《颛顼历》，“朔晦月见，弦望满亏多非是”，很不准确，而且也不符合西汉的实际情况。汉文帝即位不久，太中大夫贾谊就提出改历的建议，却没有受到重视，后来汉文帝让鲁人公孙臣制订改历的计划，但直到他驾崩，改历仍然没有被提上日程。汉武帝即位后政务繁忙，无暇谈及修改历法的事，直到北疆平定、中央集权的统治巩固、国内太平之后，他才想起这件事来，尤其泰山封禅大典之后，他更觉得历法是很有必要修改的了，但究竟什么时候改、怎样改，倡哪一德，崇哪一色，却是有点犹豫的。

自战国以来，就流行着齐人邹衍最先倡导的“五德终始”说。这种学说认为，王朝的盛衰是按木、火、土、金、水这五行生克的顺序进行的，这五种物质也叫“五德”，谁要得了其中一德，就是真命天子，就具有了无上的尊威。五德中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紧密联系的，也可以说是一个统一体。同时又有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

木胜土、土胜水，这五德之间又是对立的，可以说各不相融，邹衍就以此来解释王朝更替和时事的变迁。五德是和各个朝代的制度相对应的，它们轮番替代，不断循环，因而就有了朝代的变迁。当某一德在某个朝代兴盛时，这个朝代的统治者就具备了这种“德”，就说明他代表了天的意志，是真命天子，其证据，就是应天命而出现的各种符瑞。邹衍用这种观点来解释历史上的朝代，说黄帝时兴土德，因为土是黄色的，因而崇尚黄色；大禹时兴木德，草木四季繁茂，到了冬天也是郁郁葱葱，木气很胜。因为木是青色，因而崇尚青色；商汤时兴金德，因金为白色，因而崇尚白色；周文王时，有火赤鸟衔丹书，飞到周朝的领地，周朝就崇尚红色，兴火德。这种学说后来被秦始皇所接受，他按照五德终始的原理，推断出秦朝应当兴水德，——水胜火，秦代周，自然应当是兴水德了。于是他按照水德订立了一套制度：以十月朔为一年的开始；数字以“六”为吉利数，许多物品都以“六”为标准尺度，比如符为六寸，步为六尺，车轨为六尺，皇帝外出乘车时配集的马匹数也是为六，等等。全国上下，都崇尚黑色，衣服以黑为贵，旌旗也都是黑色的，皇宫内外，黑色成了权威的象征，代表着天子的威严。

汉朝建立之后，“汉承秦制”，并没有做多大的改动。汉高祖刘邦自认为得水德，跟秦始皇一样，因而制度也毋庸大的改革，并以青年时斩蛇一事来做为依据。

据说汉高祖刘邦当年在沛县时，一次酒后见一大蛇挡道，随后将它斩杀了，后来遇到一位哭哭啼啼的老妇人，刘邦问她为何啼哭，老妇人哭道：“有人杀了我的孩子啊！”刘邦乘

着酒兴，拍着胸脯说：“谁杀的？我去给你报仇！”老妇人摇摇头，“你替我报不了仇。我的孩子是白帝子，今天变成了蛇，躺在路上，被赤帝子杀了，此仇无法报啊，所以我只有哭泣。”刘邦一听，暗吃一惊，将这件事记在了心里。

汉兴秦亡后，刘邦想，白帝子赤帝子想必都是可以变化成蛇的，既然如此，汉朝与秦朝同兴一德又有什么不对呢？加之汉朝初立，许多事情需要处理，汉初基本上就承袭了秦朝有关水德的说法。

现在到了汉武帝统领天下，局势大定，修改历法重新被提上了日程。自元封七年（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和太中大夫公孙卿、壶遂等人上书提议修改历法后，改历工作就逐渐进入了实施阶段。

司马迁受命主持改历工作。历法的改定，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司马迁对此十分谨慎，除了汉武帝指定的公孙卿、壶遂、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人外，司马迁还邀请了许多在这方面造诣很深的学士专家来参加改历工作，如邓平、司马可、侯宜君、儿宽、洛下閎、唐都等等都被请来了，官府的、民间的，甚至连隐士高人统统被请到了皇宫，参与这一举足轻重的改历工作。这里很值得一提的是唐都，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经向他请教过观测天文星象的观测方法，论辈份，司马迁该叫他“师祖”了，资历自然是十分老成。

几十位专家经过精密推算，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制定出了新历，即历史上有名的《太初历》。《汉书》中对此历大为称道，说它“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其科学、精密程度，自然是远远胜过那《颛顼历》的了。

《太初历》将一年的开始定在正月，并一改旧历中以冬至月（今阴历十一月）为正月的传统，将正月定在建寅之月，即现在的阴历元月，称之为“夏正”。直到今天，阴历还叫做“夏历”。这种夏正制，贯通了二十四节气，并以没有中气的月份为闰月，对于农业生产来说，这是十分有利的，因而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

汉武帝对这《太初历》自然也是十分满意的了，他下诏将元封七年（公元前104年）改为太初元年，并按照当年贾谊、公孙臣等人的建议，下令改制：颜色以黄为贵，数字以五为吉，定官名，协音律。自此，汉朝建立百多年来，终于完成了改制，正式以土德自居了。

《太初历》对后世影响是很深远的，它是我国古代历法变革的一项重大成果，为后来历法的发展，进一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以阴历元月为一年开始的做法，其对晦朔弦望的准确订正，直到现在，还被人们采用，可以说，它对中国人的时间观念产生了几千年的影响。

《太初历》的制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作为这项工作的主持者，司马迁又当作如何感想呢？《太初历》的很大一部分工作，都是他承担的，采用夏正制的做法，也是他提出来的，做为自小受到父亲言传身教、此后又刻苦钻研星历知识的司马迁，在天文方面的修养、造诣丝毫不逊于其他专家。对于《太初历》的成功，他应当是很满意的了，而实际上，对于自己为之付出了诸多汗水的新历，司马迁并不觉得十分如意，甚至在后来的《史记》中，对这《太初历》也提及得很少。在他看来，《太初历》还是有许多缺陷的，比如汉武帝采用了邓

平等人的建议，以音律起历，将本来与历法风马牛不相及的音律牵强附会于《太初历》，而且汉武帝还接受了邓平等提出的 81 是一日之分的说法，将《太初历》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在历元的安排上，他的主张也没有被采纳，因而虽然作为《太初历》的主要制订者，司马迁对此历并不是十分推崇的。

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太初历》仍不失为一部好历法，作为此历的主要制订者，司马迁的功劳也是非常巨大的。

就在新历问世的这一年，司马迁的著述工作也开始了。

从 20 岁漫游大江南北算起，司马迁扈从巡游，足迹遍及祖国东南西北，对各地的地形、气候、人情、风俗了如指掌，对各种历史遗闻、历史传说，经过了实地的考证；从 10 岁诵古文时算起，司马迁师从董仲舒、孔安国，后又得以进入国家藏书处博览群书，古今知识早已烂熟于心；从上古时代到汉武帝的历史发展概况，他也有了个清晰的轮廓。汉朝改制已经完成了，国内太平，是论著历史的时候了！

司马谈临死的时候曾经说过，司马家族世典周史，周公死了五百年后，孔子出世，著《春秋》载述历史，从孔子死后到现在，又有五百年了，应该接续孔子的事业，到了将历史的载述继续下去的时候了！

上大夫壶遂问司马迁：“孔子当初为什么要作《春秋》呢？”司马迁曾经跟董仲舒学过《春秋》，董仲舒的观念对他是有很大影响的，因而他先用董仲舒的观点来回答：“我听董仲舒说，周朝的王道废颓，人心不古，孔子担任鲁国的司寇的时候，宣讲他的“礼”、“仁”等主张，对人们的言行提出道德要求，却

被众诸侯视为对他们的危害，他的主张被众诸侯抛弃，连本国的大夫们，也给他设置障碍，不让他顺利地鲁国普及他的观点。孔子见天下混乱，自己的主张不会被采纳，自己的建议不会被施行，就将自己的理想寓于对 242 年历史的评论中，褒贬时事，表明是非，作为以后天下行事的标准。孔子贬斥诸侯，声讨大夫，讥评天子，都是为了阐明王道、宣扬王道啊！孔子他曾说：‘与其把是非曲直挂在口头，空发议论，还不如把它们体现在具体的事物中，这样就明显得多，也深刻得多了。’”

接着，司马迁又对壶遂谈了自己对《春秋》这部书的看法，他认为，《春秋》这部书，上能阐明三王之道，下则可以分辨人世间的纲常伦理，可以解释疑难事理，明辨是非，可以判断犹豫难决的事情，还可以表扬善良的事物，谴责邪恶的现象，尊敬德才兼备的贤良，鄙薄无耻的不肖之徒。更重要的，是它可以用来恢复已经灭亡的国家，延续已经断绝的世系，修残补缺，振兴已经颓荒的事业，这都是王道中的重要内容。可见，司马迁对孔子的这一著述，是十分推崇的，《春秋》在他心中，成了无所不能的圣书。

司马迁又将《春秋》与《易》、《礼》、《尚书》、《诗》、《乐》等一一比较，来向壶遂阐明《春秋》一书的特点。他说：“《易》是讲天地、阴阳、四季、五行的关系，长于表示各种变化；《礼》是用来安排人世间的伦理纲常，长于指导人们的行动；《尚书》记录的是上古帝王的史迹，长于指导政事；《诗》记述的是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之类的事情，长于体现各地风俗人情；《乐》是礼乐产生的基础，长

于陶冶人们的情操，使人心情舒畅和美。与这些相比较起来，《春秋》明辨是非，所以长于治理百姓。因此，《礼》就用来节制人的言行举止，《乐》用来抒发平和的情感，引发人们对礼乐的爱好，《书》用来指导政事，《诗》用来表达思想，吐露心意，《易》用来解释各种变化，而《春秋》呢，则是用来阐明仁义道德，指导人们按照仁义道德来做事。如果要治理乱世，使世道恢复安定的秩序，没有比《春秋》更合适的了。《春秋》的文字共有几万，其精髓有几千，万事万物的聚散离合，都可以在《春秋》之中找到依据。”

司马迁显然越说越激动，他站起身来，在壶遂面前来回走着，壶遂对他的学识见解和滔滔文采十分赞叹，正要开口说话，司马迁忽然转过身来，满脸激愤的表情，接着说：“你知道吗？《春秋》中记载的谋杀国君的事件有 36 起，灭亡的国家有 52 个，失去了政权，不得不四处逃亡的诸侯更是多得无法计数，这都是因为失掉了仁义这个根本啊！正如《易》上面所说：‘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臣子杀了君王，儿子杀了父亲，这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造成的恶果，这是长时间内仁义不存所导致的结局！所以，一国之主不能不通晓《春秋》，否则既辨不清面前进馋言的小人，又不知道在背后叛逆作恶的贼子；做臣子的不能不通晓《春秋》，否则就不能妥当地处理事情，不能坚持正确的原则，遇到变化了的情况，也不知道怎样变通处理。作为一国之君、一家之主，如果不掌握《春秋》的要义，必然要蒙受首恶这一不好的名声；作为臣民、儿子，如果不掌握《春秋》的要义，必然会因为弑君弑父而被判以极刑。他们犯了恶，却不知晓，还以为自己做的是好

事，是光明正大的事，这都是因为他们不通晓《春秋》的大义，没有掌握做人的根本啊！直到恶事败露，受到应有的惩罚，即使人家给他加上空造的罪名，他们也是不敢推卸的，谁让他们不明大义呢？不明大义，以至于君不像君的样子，臣不像臣的样子，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也不像儿子，简直乱了套。君不像君，他的权威就会受到触犯，臣子就会对他不尊敬；臣不像臣，就会遭到被诛杀的命运；父不像父，就没有了人伦之道；子不像子，就会大逆不孝，遭到众人耻笑。这四种行为，是天下最大的过失，把‘天下最大的过失’这个罪名加到他们头上，他们也只好接受而不敢有所推卸。所以说，《春秋》是礼义的本源。礼是在不好的事情发生之前就加以禁止防范，法则是不好的事情发生之后再去施以刑罚，加以惩处，这哪一样更明智呢？但是法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礼的潜移默化的防范作用却往往受到人们的忽视啊！”

壶遂连连点头称是，对司马迁的这一番议论佩服之极，但同时他也有点疑惑：孔子之所以作《春秋》，是因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上没有贤明的君主赏识他，下没有人重用他，他的才能得不到施展，他的观点得不到认同，所以才将自己的观点融于几百年的具体历史事件中，让后代的人们去评判是非曲直，让后代的人们明白事情真相。现在汉朝兴盛，上有贤明的君主，下有固定的职守，太史公司马迁干吗还想著述历史呢？现在国家繁荣兴盛，人民生活安定，各项事物都被安排得妥妥贴贴，难道还有论述的必要吗？

司马迁对他的疑惑做出了解释：“不全是这样的。我曾经听我父亲说：‘伏羲氏时代民风非常纯朴厚道，有《易》、《八

卦》流传下来；尧、舜的盛世，《尚书》中都有详细记载，《礼》、《乐》也因尧舜的贤德而兴盛起来；商汤、周武王时代的兴隆，受到历代文人学士的赞颂；《春秋》宣扬善事，贬斥邪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的繁荣、民心的纯朴，并且对周王室大加赞扬，它并不仅仅是对世事的讥讽啊。’汉朝自建立以来，到当今圣明的天子掌管国事，得到了上天降下的祥瑞，设坛祭天地，到泰山举行了封禅大典，又修改历法，改变衣服、器具的颜色，将与土德相适应的黄色推到了至尊地位，这都是受命于上天的啊！天子的恩泽像流水一样滋润着无穷无尽的土地，连海外不同风俗的国家，都派来了懂汉语的使者叩境，请求上贡礼品，请求拜见天子，使者多得数都数不清。臣下百官竭力颂扬天子的英明贤德，还不能完全表达自己的心意。再者说来，贤能的士人没有被重用，这是当权者的过失，是国君的耻辱；皇上英明贤德但他的德行没有被广泛宣扬，这是官吏的失职啊！我担任太史令，如果抛开了圣明天子的英明智慧而不去记载，埋没了功臣、诸侯和贤大夫的功业而不去加以表述，背弃了我父亲的遗愿，这是莫大的罪过啊。我所说的论著历史是记述历史事实，整理、编订世代相传的历史材料，并不是什么创作，而您把它与《春秋》相比，是有些误会吧。”

对壶遂的一席话，既是说给壶遂听，也是说给他自己听的，自此，他就开始了继《春秋》的著述。这一年，是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04年，司马迁42岁。

筹划已久的事情，一旦付诸现实，该是以多大的激情投入啊！42岁了！人到中年，著书的热情在司马迁心中燃烧，他

看上去显得那么精力充沛，那么神采奕奕，哪像个 42 岁的人呢？历史的使命鞭策着他，父亲的遗命督促着他，宏伟的理想激励着他，司马迁日夜奋笔疾书，挥毫洒墨。满腹经纶，恨不能立即化成行行文字篇篇文章。

可是著述工作常常被汉武帝的出游打断。汉武帝是不安于呆在皇宫里的，他要出游、他要巡狩、他要祭祀，几乎每年都不间断。作为太史令的司马迁，也只得放下手中的笔去迎合汉武帝的爱好。

据《汉书》记载，从太初元年到天汉三年（公元前 98 年），汉武帝的车辇几乎没有休息过，太初元年冬十月到泰山，秋八月到宁夏；二年三月到河东；三年春正月东巡海上，夏四月修封泰山，……司马迁只能在汉武帝出游的间隙去继续他的著述。每次都是来不及拍去身上的尘土，来不及放松一下疲惫的筋骨，他就走进书室开始构思他的著述。

著述工作就在断断续续中进行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虽然东奔西跑很辛苦，虽然属于他自己的时间并不多，著述毕竟在继续着，直到有一天，大祸降临，司马迁陷入了痛苦的深渊。

## 第四章 祸起李陵案

公元前 119 年，汉军与匈奴展开决战，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各领精兵 5 万，向匈奴总部发起进攻，汉军一路势如破竹，将匈奴单于打得落荒而逃，并且还俘虏了匈奴的相国、小王、将军等重要人物共 83 人之多。从此以后，匈奴向西迁移，再也不敢对汉朝有所侵犯，但不是说，从此匈奴就乖乖地顺从于汉朝了，实际上，西迁以后的匈奴，一直在蓄精养锐，伺机反攻。后来汉朝和匈奴也曾有过几次和谈，但都没有成功。公元前 107 年，匈奴甚至还扣留了汉朝派去的使者路充国，此后又多次侵扰汉朝的边境，汉武帝决定再次对匈奴用兵。太初四年（公元前 101 年），汉武帝下诏伐匈奴。匈奴单于初立，新单于且鞮侯闻风丧胆，派使者去跟汉武帝说：“我，儿子，岂敢同汉朝天子相比？汉朝的天子，是我的长辈。”并且将扣留了几年的路充国等都放了回来。汉武帝轻信了且鞮侯的话，为了表示汉朝的豁达大度，汉武帝不仅把扣留的匈奴使臣送还，还派了苏武、张胜、常惠等人，带着丰厚的礼物再次出使匈奴，转达汉武帝对单于且鞮侯的问候。不料且鞮侯见了汉朝使者后，反而变得十分傲慢，他把汉朝使者的友好态度，当成了对他匈奴小国的畏惧，这使得两国的关系又一次出现

裂痕。不仅如此，匈奴方面还扣留了苏武等人，把苏武赶到北海（今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去牧羊，苏武牧羊的历史故事就是由此而来的。苏武在寂寥无人的北海整整放了 19 年的羊，后来才被放归汉朝。

汉武帝得到苏武等人被扣留的消息后，于天汉二年（公元前 99 年），派贰师将军李广利领兵 3 万，从酒泉（今甘肃酒泉县）出发，与匈奴的右贤王交锋于天山。这李广利，并非是一块带兵的料，只因他妹妹是汉武帝的宠妃，他就借着这层裙带关系爬上了贰师将军的座位，实际才能十分平庸，可以说是十分无能，这样的人领兵与匈奴作战，有什么后果是可想而知的。果然，损兵折将，领着剩下的二三成兵力灰溜溜地回来了，却还要装出一副苦战告捷的模样。

在李广利领兵去攻打匈奴的时候，李陵负责掌管这 3 万军队的辎重。李陵是汉朝名将李广的孙子，他长于骑射，谦和仁爱，很得人心，颇有李广的遗风，受到汉武帝的赏识。他曾经奉汉武帝之命，带着 800 骑兵，深入匈奴的境地去探测地形，回来后担任骑都尉，并按照汉武帝的指示，在酒泉、张掖一带，练兵 5000 余人，准备用来对付匈奴。

凭李陵一番平匈奴的大志，岂肯在无能的李广利手下掌管辎重？于是他急忙赶往长安，面见天子，请求天子收回成命。

武帝见李陵不肯听从他的指派，有点不大高兴，他让李陵阐述理由，李陵说：“陛下，我奉您的旨意在酒泉、张掖一带练兵，不敢稍怠。所挑选的士兵都是荆楚之地的勇士、奇才剑客，他们勇猛有加，才智过人，力气大得可以跟猛虎搏

斗，骑射技术也十分精湛。我愿意带领他们深入到匈奴的腹地，引开一部分匈奴兵力，从而减轻贰师将军的正面压力。”武帝稍加迟疑，对他说：“将士归谁统令是无关紧要，可是我派出的兵力太多，现在分不出骑兵给你啊！”李陵见武帝已经被自己说动了心，大喜，倒地便拜，“皇上，我不需要骑兵，我就用 5000 步兵直捣匈奴的巢穴，以寡击众！”汉武帝很赞赏他的这份胆量，遂批准了他的请求。

李陵回到练兵的地方，忙于整顿军备，筹集干粮，5000 名壮士个个也是摩拳擦掌，豪情满怀。一切都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之中，忽然朝廷传下来圣旨，汉武帝命令他务必要在九月份到达东浚稽山（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阿尔浑河与图拉河之间）南面的龙勒河，观察匈奴的动向，如果没发现匈奴，就到受降城（今内蒙古巴彦淖尔盟狼山西北）整编队伍，休养士兵。

汉武帝对李陵主动请战的勇气不是很欣赏吗？既然准了李陵的请求，又怎么突然下诏干涉李陵的行踪呢？这里面的细节李陵就未必知道得很清楚了。

原来当日汉武帝准了李陵的请求之后，为了保险起见，又派了强弩都尉路博德去接应他。这路博德曾经在伐南越之中立过大功，被拜过伏波将军，资历自然要比李陵老得多，他很不愿意屈从于李陵这一出道不久的小将，因而借口匈奴正兵强马壮，不好对付，请求缓兵，次年春天再去。汉武帝疑心这是李陵自己夸了海口之后又后悔了，因而托路博德这样说。他很不高兴，急令李陵出兵，同时也命令路博德马上出兵西河（今绥远境内黄河以西地区）截断敌人的后路。

李陵接到命令后不敢拖延，马上率领他的 5000 士兵出发了。他们从居延（今宁夏北部）向北，走了 30 多天之后，到达了浚稽山。李陵一面派人安营扎寨，一面细细勘探地形，并且叫人把沿途的地形都画了下来，交给部下陈步乐，让他先回去向汉武帝禀报。

陈步乐见了汉武帝之后，将李陵那边的情况大大宣扬了一番，说李陵领兵有方，很得人心，5000 名士兵都肯为他效尽全力，死且不辞。汉武帝一听大喜，顿时觉得胜利在望。盛喜之下，将陈步乐留在朝廷，做了一名郎官。

在朝廷上下皆以为李陵这边万事顺通、胜利指日可待的时候，李陵他们却陷入了一场死战。

原来陈步乐走后不久，他们就被匈奴兵力发现了，随即六倍于他们的敌军将他们团团围住，匈奴单于亲自领着一队人马向李陵他们冲过来，面对潮水般涌来的敌军，李陵异常镇定，他排好阵式，命令士兵向敌军放箭，顿时千弩齐发，敌军纷纷落马，单于被汉军的神威所震慑，不敢再进一步，领着剩余兵力仓惶向浚稽山上逃去，汉军乘胜追击，又杀了几千匈奴。

初战告捷，军士们无不欢欣鼓舞，却没料到一场更大的苦战正等待着他们。

那单于损兵折将，岂肯善罢干休？马上又亲领了 8 万多人马再次攻打汉军，李陵他们一面沉着迎战，一面向南方撤退，几天之后，来到了一个山谷，连日杀敌，士兵中已经有不少中箭受伤的，李陵将队伍重新编排了一下，次日又杀了敌军 3000 多人。5000 壮士浴血奋战，到此时已死伤累累，而

朝廷竟没有派一名援军前来救助。李陵见敌军实在太多，就想沿着龙城（今鄂尔浑河西侧和硕柴达木湖附近）的故道回师，于是他领了士兵向东南方向撤退。四五天之后，一行人走到了一个有芦苇的沼泽地，匈奴从上风放火，顿时一片火海将他们包围，为了自救，李陵和士兵们放火烧掉了自己周围的芦苇，以免火势蔓延过来。这一危险过后，这一群勇士又继续向南方行走。不久，到了一座山下，单于亦紧紧追击到了南山（今阿尔泰山的一部分）。单于在南山上观望了一下陵军的阵势，觉得这队疲惫之师已经不堪一击了，于是派了他的儿子前去攻打陵军，没料到李陵他们依旧异常英猛，辗转于树木丛林之间，又杀了几千匈奴，单于见事情不妙，正要增派兵力，李陵已经发现了他，遂令发连弩射杀他，嗖嗖利箭飞来，单于吓得逃下山去了。

回到军帐的单于惊魂未定，陵军的英勇还击让他束手无策，同时，他也疑心陵军且战且退，是不是想把他们引入汉军的大埋伏之中，因而是进，是退，单于犹豫不定。

恰在此时，李陵军中出了一个叛徒，他向单于告密说：“陵军没有后援，而且箭都快用光了。现在只有李陵和成安侯韩延年各领了 800 人在前面抵抗，那分别打着黄旗和白旗的就是。只要用精锐兵力把他们射杀了，陵军就可以马上攻破了。”

单于一听，大喜过望，马上派兵再一次围攻陵军。李陵他们被困在山谷里，匈奴在山上居高临下，从四面八方向他们射箭，李陵率兵士一面抵挡如雨的飞箭，一面向南突围，50 万支箭很快用光了，剩下的 3000 士兵弃了军车，砍下车辐当

作武器，军官们用短刀与敌军搏斗，他们走进了峡谷。单于率兵赶来，封住了峡谷的出路，并且命令士兵借着山体的掩护向谷中投大石头，陵军躲闪不及，死伤惨重，无法继续与众多的匈奴兵力抗衡了。这天黄昏，李陵脱下戎装，换上便衣独自走出营寨，他要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去取单于的首级。许久，许久，李陵都还没有回来，将士们忐忑不安地等待着、猜测着，十分担心他的安危。终于，他回来了，手中空空，满脸悲愤之色，“败了，失败了！该死啊！”他长叹一声，望着面前随他出生入死的将士们，他觉得心里有愧。可是局势已经发展到了这个地步，他李陵已经无法挽回了，其实，这能怪他无能，能怪他没有尽力吗？以 5000 兵力，与 80000 敌军抗衡，周旋于敌军的领地，前有强敌，后无援军，5000 将士孤军奋战，杀敌无数已经耗尽了所有的气力。可是朝廷呢？竟然对他们的生死不闻不问，此地距汉朝的边境不过一百来里了，陵军死战峡谷的消息早传到了汉廷，可是汉武帝竟没有派一兵一卒去支援他们。面对惨局，李陵满心悲愤，一名军吏劝他投降，说：“将军您威震匈奴，此次战败是上天的安排，不如暂时投降，以后总有机会回去的。当年浞野侯赵破奴被敌人俘虏，后来逃了回去，天子不也是对他很好吗？”李陵冲他一瞪眼，喝道：“你劝我投降，叫我不死，难道配称‘壮士’吗！”于是折断了所有的旌旗，将贵重物品埋在地下，叹道：“如果再有几十支箭，我们就可以突围了，现在连作战的东西都没有了，等到天亮，恐怕只能束手受缚了！与其大家同归于尽，不如各自散开了去，有能够逃出去的，就回去向天子复命吧！”说罢，分给将士每人二升干粮，一片冰，准备

突围，能突围到居延城的，就等着集合。到了夜半时分，李陵和韩延年上了马，向峡谷的出口冲去，后面仅仅有 10 多个跟随着，敌军却有数千人追了上来，一番殊死搏斗之后，韩延年战死了，李陵自叹无颜再见天子，遂下马投降了。

李陵兵败投降的消息传到了朝廷，汉武帝怒不可止，先把李陵原来的部下陈步乐叫来责问，陈步乐吓得自杀了，然后又问众臣的态度，朝廷上下没有一个敢为李陵说好话的，都生怕触怒了汉武帝，招罪下来，家小难保。

问到了司马迁，司马迁见朝中众臣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财产，家室妻小，皆众口一辞说李陵的坏话，心里早不是滋味了，他很为李陵感到不平，按照他的看法，李陵的投降是有原因的，不应该受到如此责难，倒是那些成天无所事事的臣子，落井下石，颇为不耻。司马迁虽然跟李陵交往不多，两人的志趣也不相投，但凭着平日的观察，他觉得李陵是一个“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的奇士。这样的奇士，领着 5000 壮士冒着极大的危险深入敌军腹地，与敌军苦战了那么多天，周旋了几千里地，兵器用完了，气力耗尽了，将士死伤累累，他们面对强大的敌人毫无惧色，全然不顾身后没有一名援军，这样的气节多么值得赞叹啊！现在朝中大小官吏皆指责李陵，他司马迁再不主持公道，李陵的罪名就是无法洗刷的了，因而，面对汉武帝的询问，司马迁直抒己见。他将李陵的人品大大夸扬了一番，说他具有“国土之风”，对李陵率军孤军奋战、给匈奴以沉重打击的功劳，也是毫不避讳地大加赞赏，说他可以与古代的名将相比，对于那些落井下

石的臣子，他也表示了他的不屑。

司马迁滔滔而论，没有注意到汉武帝的脸色早已十分阴沉。最后，他请求汉武帝念及李陵的功绩，不要降罪于李陵及其全家。汉武帝早听得不耐烦了，他可不是来听李陵好话的，他以为司马迁竭力赞颂李陵的功劳，是想借讥讽刺无能的贰师将军、他宠姬的兄弟，是在为李陵游说，一怒之下，以“诬罔”的罪名，将司马迁打入牢狱！

正直的司马迁！受非难的司马迁！只因替并不熟识的人讲了几句公道话，身陷囹圄，从此身体与精神上都受尽折磨！

冷冰冰的君臣之情，冷冰冰的牢狱，冷冰冰的枷锁，突遭此难，司马迁无处申冤。按照当时的法律，诬罔君主，是死罪一条。要么交 50 万钱赎罪，要么受宫刑，要么领死。司马迁家里并不富足，哪里拿得出 50 万赎金？亲友们慑于汉武帝的淫威，也都不愿伸手相救，朝中官吏顾及到自身的安危，自然也是不会替司马迁说话的，因而第一条路，是行不通的了！现在摆在司马迁面前的，有两种选择，或者是去受死，或者去受那侮辱人格的宫刑。何去何从，司马迁开始了生死决策。

宫刑又叫腐刑，是古时极为残忍地摧残人的意志、折磨人的精神的一种行刑方式，受刑之后，男不男，女不女，其耻辱是一般人所忍受不了的。

司马迁想到了死，他宁死而不愿去受这等侮辱，可是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到底值不值得呢？人固有一死，或重如泰山，或轻如鸿毛，他这样去死，同九头牛身上失掉一根汗毛，同蝼蛄蚂蚁又有什么区别呢？可是，一想到将要接受那

残酷的宫刑，司马迁心里又万般痛楚，在他看来，“刑不上大夫”，身为士人，节操是多么重要啊，人的死法有许多种，人受辱的方式也有许多种，最上等的是不污辱祖宗的死法，最卑贱、最污辱的就莫过于受宫刑了，刚正的人，是谁也受不了这种侮辱的啊！

司马迁心如蚁噬，是苟且偷生，还是决然赴死？这两种选择交替占据着他的头脑，使他痛苦不堪，他的精神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书！一丝光亮划过他的头脑，书！他的精神为之一振，书！他终于下定决心要忍辱偷生了。

书——他的理想，他真正的生命，两代人的心血，岂能半途而废！父亲的遗愿，岂能抛到一边？

为了书，为了他的著述得以继续下去，司马迁选择了宫刑！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这需要多么坚强的意志啊！

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司马迁面无愠色，下蚕室，接受了残酷的宫刑！

夜，漆黑的夜，司马迁的心里比那漆黑的夜还要凄冷，他的人格，他的尊严，在步入蚕室的那一刻，就全然被刽子手夺走了！天啊！为什么这么不公平，那些自私自利的人、那些勾心斗角的人、那些贪赃枉法的人、那些欺下媚上的人，一切一切的污垢，都还在吃喝玩乐、花天酒地，过着舒舒坦坦的生活，他司马迁伸张正义，反而遭到如此大难！今后的生活，今后的路，又将如何走下去？世人的面孔、朝中众臣的眼神，又将如何面对？命运啊，干吗要折磨这个可怜的人呢？难道他受的苦还不够多吗？难道他受过的累还少吗？难道你不知道还有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等着他去完成吗？命运啊，太

残忍了！汉武帝啊，太残忍了！忠言一句，就至于招致你如此毒手吗？你自命为圣明的国君，你四处巡游，洒播你的恩泽，你到处祭祀，显示你对神仙的崇敬，对人民的厚爱，这一切，到底不堪忠言的轻轻一击啊！你所谓的仁爱之心哪里去了，你圣明的面孔怎么变得如此狰狞？

难道是上天要考验司马迁的意志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当日周文王被拘禁在羑里，他推演出了《周易》；孔仲尼被围困在陈、蔡，他回鲁国之后编订了《春秋》；屈原被放逐于江南一带，他作了不朽的《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有《国语》传世；孙臆膝盖骨被截，编著了《孙臆兵法》泽及后世；吕不韦被贬谪到蜀地，作《吕览》一书；韩非子被囚禁于秦国，《说难》、《孤愤》问世；《诗》300篇，大概也是圣贤发愤而著的吧。这些人都是因为思想受到压抑，主张不能得以实现，因而把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主张贯彻于对往事的叙述当中，让后人得以借鉴。相同的命运，就要降临到司马迁身上么？

古今之中，默默死去的人简直无以计数，人就像那草芥一样，过了一个生命周期，死了，又一个生命周期开始了，于是一个生命又出现了。人都会死的，重如泰山的也好，轻如鸿毛的也罢，都会被历史的尘埃覆盖，只是泰山被覆盖，要历经几百年、几千年，覆盖之后，还会有轮廓昭世，历史的车轮转了一圈又一圈，各姓的朝代更替了一次又一次，黄沙掩埋了多少孤魂，古风吹走了多少往事，历史的沧桑，谁也挡不住，可是，有一样东西是被时间掩盖不了、是被历史消溶不了的，那就是——精神！人类的智慧！而得以载述这些

智慧、这些精神的书籍，自然也是万古流芳。

在精神的极度困苦与落寞之中，司马迁悟出了人世的许多艰辛，这在他以后的著述当中，都有明显的体现。以此事为转折点，如果说他以前的著述是一碗味道平和，略带苦涩的浓茶，那此后他的著述则是一坛辛辣的烈酒了！

受刑之后，一股巨大的力量推动着他奋笔疾书，他要把这人世间的真实面目，揭露给后人，他要把事情的善恶是非，留给后人去评判、去鉴别。

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幽暗的监牢里，只有一盏孤灯为伴，牢门外狱吏走动的脚步声，才带给他一点人世的气息，没有白天，没有黑夜，只有一个目标在他心里闪耀，忘了饥饿，忘了寒冷，只有一个理想在他头脑发光。当我们今天面对《史记》这部巨著的时候，心里是否该想想天汉三年遭难的这位几乎把一生的心血都花在了它上面的人呢？

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全国大赦，被囚禁了几年的司马迁终于得以重见天日，得到了人身自由。或许是出于悔意，或许是出于怜悯，或许是为了进一步侮辱司马迁，总之，出狱不久的司马迁，就被汉武帝委以中书令之任。中书令与尚书令的机构是类似的，主要是作为皇帝与尚书之间的联络：把皇帝的命令下达到尚书，又把尚书的奏折转呈给皇帝，一切诏奏机密，都得经过中书的耳目。从职位上来说，比起太史令来，中书令要显赫得多了，可是，司马迁心里无论如何也不愿接受这所谓“显赫”的职位，要知道，中书令从来都是由宦官担任的啊！这对他，又是一次侮辱，一次嘲讽。生活为什么如此艰辛，命运为什么如此捉弄人！

有什么办法呢？除了再一次接受这屈辱的现实。司马迁忍着精神上的巨大煎熬，坚持不懈地继续着他的著述。每每想起他所受的耻辱，他“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除了著述，这一生命中惟一的支柱，他对一切都已失去了兴趣，整天恍惚迷离、若有所失，在家里呆着不知将要做什么，出门时又不知将要往哪里去，只有将要提笔上书的时候，他的理智才恢复过来，他才成了他自己——才华横溢、擅于辞令的司马迁！

精神上的受辱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啊！此时的司马迁，已与以前判若两人了，以前的意气风发，以前的滔滔大论、以前的绚烂文采，都似乎一去不复返了！司马迁外表看上去已经十分麻木了，就像一片秋后的枯叶，在秋风中飘零、飘零，行将失去生命，行将被更多的枯叶所覆盖。可是，他内心却燃烧着熊熊的火焰，这是愤恨的火焰，这是不平的火焰，司马迁将满腹文采、满腹经纶，经过这烈火的铸炼之后，形成了一列列的文字，将他的理想、他的愤慨，倾洒于对中国几千年历史的论述当中。只有在这里，他才能找回他的尊严，只有在这里，他才能尽情发泄对社会的不满。

然而他的亲友未必这样看，当日见死不救的亲友哪能理解他刺心的痛苦，哪能顾念他深深的耻辱？连他的好友任安也把他当成一般的宦官，叫他待人接物要谨慎，要不负朝廷的重托，担负起向朝廷推贤进士的责任，如此等等。

司马迁接到信之后，内心十分苦涩，渐趋平静的心又翻起了万丈波澜，翻起了不堪回首的往事，可是该跟任安怎么解释呢？有解释的必要吗？那么大的耻辱既然已经忍受下来

了，那就继续忍受下去吧，不用向别人解释什么了，别人的理解也已不再需要了。

几个月之后，司马迁听说任安遭了罪，将要受刑，他自己又要马上随汉武帝去雍地，以后怕是再也见不着任安了，因此，给任安回了一封信，这就是有名的《报任安书》。书中，司马迁满怀激愤，申诉了自己的不幸遭遇，控诉了汉武帝的是非不明、残暴无情，将自己目前的境况，也对任安坦然相告，让任安明白他的苦衷。同时也告诉任安，他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巨著，已经基本完稿了！

任安是否收到这封信，他收到信后是否为司马迁的不幸表示同情，或者对司马迁巨著的初步完稿表示高兴，这都已无从考证了，这封信，却流传了下来。同时，我们也从他的信中得知，继《春秋》而著述，这一工作已基本完成了！

多少艰辛、多少屈辱、多少汗水、多少曲折，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终于成一家之言。历史是沉甸甸的，司马迁告诉给我们的历史更加沉甸甸。各地的奔波、史料的搜集、古籍的整理，各种艰辛，各种劳累，都伴着屈辱的泪水化成了长篇巨著——《史记》！

自此之后，司马迁的事迹就没有记载了，就像一粒明珠，渐渐没入了尘埃。他活了多久，怎样死的，死在哪里，都已经成了历史永远的谜。记述历史的人，自己却被历史遗忘，这又是命运对他的捉弄吗？但这毕竟是不重要的了，他的精神，他的《史记》，已经足以使后人对他永不忘怀了。

有关司马迁的家庭情况，历史上也少有记载，我们现在只知道，他曾经有过一个女儿，嫁给了官至丞相的陕西华阴

人杨敞。这杨敞原来在霍去病的弟弟霍光的幕府中任职，后来因为霍光的关系，做了大司农、御史大夫，后来又做了丞相，并且被封为安平侯。官场上是够得意的了，但此人胆小怕事，并没有什么建树。杨敞有两个儿子：杨忠和杨恽。其中杨恽的性格很像他的外祖父司马迁，对司马迁也十分仰慕，喜欢读外祖父的《史记》，并且将其广泛宣扬，使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司马迁，了解了司马迁的《史记》。汉宣帝五凤四年（公元前 54 年），杨恽因口祸被腰斩。

王莽时，司马迁的后代被封为“史通子”。

历史没有将司马迁的生平详细记载下来，司马迁却记载了整部历史，这就是流芳千古的《史记》！

## 第五章 《史记》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因司马迁做过太史令而得名。东汉时始有《史记》这一说法，后沿用此名。

《史记》记述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共约3000多年的历史，规模十分宏大，究其具体内容，包括：

十二本纪：《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吕后本纪》、《孝文本纪》、《孝景本纪》、《孝武本纪》。

十表：《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八书：《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

三十世家：《吴太伯世家》、《齐太公世家》、《鲁周公世家》、《燕召公世家》、《管蔡世家》、《陈杞世家》、《卫康叔世家》、《宋微子世家》、《晋世家》、《楚世家》、《越王勾践世家》、《郑世家》、《赵世家》、《魏世家》、《韩世家》、《田敬仲完世家》、《孔子世家》、《陈涉世家》、《外戚世家》、《楚元王

世家》、《荆燕世家》、《齐悼惠王世家》、《萧相国世家》、《曹相国世家》、《留侯世家》、《陈丞相世家》、《绛侯周勃世家》、《梁孝王世家》、《五宗世家》、《三王世家》。

七十列传：《伯夷列传》、《管晏列传》、《老子韩非列传》、《司马穰苴列传》、《孙子吴起列传》、《伍子胥列传》、《仲尼弟子列传》、《商君列传》、《苏秦列传》、《张仪列传》、《樗里甘茂列传》、《穰侯列传》、《白起王翦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平原虞卿列传》、《孟尝君列传》、《魏公子列传》、《春申君列传》、《范雎蔡泽列传》、《乐毅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田单列传》、《鲁仲连邹阳列传》、《屈原贾生列传》、《吕不韦列传》、《刺客列传》、《李斯列传》、《蒙恬列传》、《张耳陈馀列传》、《魏豹彭越列传》、《黥布列传》、《淮阴侯韩信列传》、《韩王信卢绾列传》、《田儋列传》、《樊郦滕灌列传》、《张丞相仓列传》、《酈生陆贾列传》、《傅靳蒯成侯列传》、《刘敬叔孙通列传》、《季节栾布列传》、《爰盎朝错列传》、《张释之冯唐列传》、《万石张叔列传》、《田叔列传》、《扁鹊仓公列传》、《吴王濞列传》、《魏其武安列传》、《韩长孺列传》、《李将军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平津主父列传》、《匈奴列传》、《南越列传》、《闽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司马相如列传》、《淮南衡山列传》、《循吏列传》、《汲郑列传》、《儒林列传》、《酷吏列传》、《大宛列传》、《游侠列传》、《佞幸列传》、《滑稽列传》、《日者列传》、《龟策列传》、《货殖列传》、《太史公自序》。

共计 130 篇，526500 字。其中，本纪是按时间顺序记载历代帝王的政迹、言行的简史，同时也包括当时社会上的重

大事件、重大变故。因帝王为天下本统，所以写帝王的事迹称本纪；表是用表格的形式谱列各时期的重大事件，作为纪传的补充；书是各种制度、各种专题的记述；世家讲述的是各诸侯国的兴衰史；列传是各类人物的传记，记载了各类人物的活动情况。在全书之中，以本纪和列传为主体，后人也因此把《史记》的编写方法叫做纪传体。

《史记》本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宗旨，为中国的历史竖起了一座里程碑，这座里程碑光芒万丈，它照亮了前代的历史，也为后代人献身史学照亮了道路。它取材广泛，内容极为丰富，政治经济文化、天文地理风俗，本国人文、异国风情，无一不涉足，无一不包揽，可谓是记述中国历史的一部大百科全书。

司马迁著《史记》的目的是继《春秋》而著述，以填补孔子死后，历史记载上的空白。他效法孔子当年编订《春秋》的初衷，将自己的政治主张、思想观念等等，都寄寓于对历史的评点，褒贬世事、表明是非，以供后人明鉴，也作为后人行事的准则。同时，他也吸取了《春秋》的创作方法，即从人事的角度来叙述历史，并将这种创作方法加以发扬光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以人物为中心来记载历史的纪传体例。

在司马迁看来，历史是由人类的各种活动组成的，人类是历史的主体，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而并非像历代统治者们鼓吹的那样：圣贤创造了历史，天子主宰着历史。古今之中所有重大事件、重大变故，都是各种人物活动的结果，在一个历史时期，各种人物扮演着各种角色，行使着这种角色的权力，履行着这种角色的义务，从而表现出这种角色的特

点，于是这段历史时期总的特点，就是这些角色特点的交叉、重合、或者是冲突。

纵观《史记》全书，130篇之中，以人物活动为中心的篇目占了100多，是绝对的多数。“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从王侯到将相，从权贵到平民，从君子到小人，从政治大家到文人学士，如此等等，都可以在《史记》中找到位置，这就是一部优秀的历史巨著的成功之处，因为人类的历史，本来就是由各色人物的活动贯穿而成的。——如一根项链，人类是点，人类也是线，几股线绞到一起有了点，一个点散开便成了线。在这一点上，司马迁是超过了以前所有的学者的。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他的以人物为中心的记叙当中，平民的位置得以抬升，得以重视。在此之前，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贫苦平民，是所谓的“卑贱之人”，在哪一部文献当中都是没有得到如此抬举的。布衣的孔子、佣耕的陈涉，有了与各代诸侯王同等的地位；看守城门的侯嬴、市中卖肉的朱亥、四处漂泊的游侠，不再是世俗意义上的下层小人，而是各具特色、性格鲜明的同样有喜有悲、会哭会笑的得到历史承认的人！

司马迁把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奉献给了我们，在他看来，历史就是历史，历史就应当是公正的、不存在什么偏见的，历史是任何权贵、何种势力都无可更改的。基于此，他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不虚美，不隐恶”，客观地评价历史事件，不囿于传统观念。项羽——西汉开国皇帝刘邦的手下败将，兵败垓下，自刎乌江，一向是汉朝统治者讥笑的对象，司马迁却将他列入了本纪，位在汉高祖刘邦之前、秦始皇嬴政之后，

与这两位皇帝鼎立争雄，这也是古时任何一位学者做不来的，何况司马迁著书之时，正是西汉兴盛之期，如此大逆不道，颂扬汉朝败将，岂不是不要命了？司马迁不怕，他已经经历了比死还厉害的刑罚，难道还怕死吗？他不争名、不争利，只求还历史以真实，现实中的弱肉强食、恃强凌弱，也见得多了、听得多了，他可不想将他笔下的历史人物贯以现实的污秽，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贵贱评古人。项羽败了，但他在推翻秦王朝的战争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项羽死了，但他的冲天豪气、他的凌云壮志永存，项羽虽败犹荣，项羽虽死犹生，在司马迁心中，他虽然鲁莽，但仍不失为一个大英雄，而司马迁对英雄人物，一向是崇拜之至的。相比之下，对于西汉的建立者刘邦，司马迁言辞之间，早对其人品流露出鄙视之意，这个好酒色的无赖，上不孝、下不亲，为了当皇帝、得天下，父亲、儿子、妻子、部下的性命安危可以一概不管，却偏偏骗得了那么多良将的信任，得到那么多将才的辅助，虚伪的面孔掩饰着他的言行，他成功了，成功之后的他，歹毒之心表现得更为明显，诛杀功臣，血流成河！阴险残忍，比那秦始皇又差得了几分？对于这样一个政治流氓，司马迁是没有一丁点好感的，即使身为汉朝的臣子，他也不愿弃了真理去替汉高祖的行为粉饰。这在当时，是要冒很大的危险的，也就只有他，才敢如此大胆地对汉武帝的祖父大加评论，才敢蔑视权贵，让真实在作品中任意驰骋！

对于陈胜、吴广的起义，司马迁的态度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陈胜、吴广起义，昙花一现，然而就是这“一现”的瞬间，点燃了秦末农民起义的熊

熊火焰，所谓“天下之端，自涉发难。”司马迁不看陈胜吴广的出身，不看陈胜吴广的财力，他只看到了陈胜吴广起义最关键的一点——“一夫作难而七庙堕”，他给了陈胜、吴广应有的历史地位，把他们列入“三十世家”，与历代诸侯王平分秋色。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肯定农民起义的作用，抬高农民起义领袖的地位，无异于与统治阶级公开对抗，于是这就成了后来各封建政权、封建思想的卫道者们攻击司马迁的一大借口，同时，这也是今天我们大力赞扬司马迁的原因之一。

3000 年的历史画面，是多么庞大；3000 年的历史脉络，是多么复杂，3000 年的历史，叫人如何把握？然而司马迁成功了！他不仅把握住了，而且把握得极好。在庞大的历史画卷上，在复杂的历史脉络面前，他就像一位能工巧匠，不慌不忙地取舍着、权衡着，最后留给我们的，是一部剪裁得当、详略有法的精典名篇。这篇包罗万象，政治、经济、文化自然不必说了，我们再来看看篇中的天文、地理、医学等方面的知识。

首先来看看天文学。司马迁身为史官，是有很深的天文学修养的，史官掌管天文星历的职责使他在这方面很有研究，以至于后来被汉武帝委以重任，主持《太初历》的制订工作。《史记》之中记载了司马迁天文思想的，主要集中在《历书》和《天官书》中。其中《历书》是我国最早的历史发展史，司马迁在此书中详细地叙述了历法的产生、发展的过程，有些虽然是根据传说来推定的，但也都与我国其他古籍中的记载相符，他有关历法的叙述，在许多古籍中都可以得到旁证，这

不能不说明司马迁是本着极大认真的态度来叙说历史的。为了得到最确切的说法，他不知查阅了多少资料、收集了多少传闻。从最远古时期的物候历（以动植物的生理变化为参照物的历法），到西汉时他亲自参与制订的《太初历》，在他的《历书》中都有详尽的记载，司马迁尽可能地把历史留下来的一切，把他能收集、整理出来的一切，经过细心剪裁之后虔诚地奉献给他的读者。

《天官书》中，司马迁充分发挥他的想象，把枯燥的星象变得十分有趣起来。原来观测星象，是根据北斗、四象、二十八宿的星官体系，观测起来费劲，记忆起来拗口，许多人因此对它敬而远之。司马迁不仅完善了这一星官体系，把它发展成为五宫二十八宿，更重要的，是他开创了一种绝妙的给星官命名的方法。他把各星官想象成同地上的人一样有生命、有血肉、有喜怒哀乐，并且赋予他们各自不同的职责，这个掌管北宫，那个把持西宫，这个是将，那个是王，这个是车，那个是马，如此等等，司马迁几乎把整个地面社会照搬到了星空，读《天官书》，犹如观一幅社会画卷，人们在轻轻松松的气氛中，就可以受到深妙的天文知识的熏陶，这不能不说是司马迁对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这种给星象命名的方法，中国人沿用了1000多年。

除了其独特的给星象命名的方法外，司马迁在《天官书》中还以一个天文学专家的高度，将有关恒星、大气、彗星、行星、月食等方面的知识一一展示给了大家。《天官书》中有各种天文星象的记载，有关于恒星亮度、色泽的记录，有关于大气散射、消光的记录、有关于星象突变的记录

等。同时，《天官书》中也对行星的运动规律进行了研究，首次发现了五大行星的逆行现象，并且采用了先进的观测行星的办法，为后人做了示范；不仅如此，《天官书》对月食的规律也进行了探讨，提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月食周期。

司马迁否定了那种处处以星象的变化来与人世间事物相联系的方法，认为所有的星象、天体的变化都是自然现象，都是有一定的规律可考的，但同时，他也没有走出星占的窠臼。星占就是利用自然现象特别是星象来占卜人间祸福，星座之间的位置、星官的色泽，日食、月食，都成了星占家们推测世事的依据。司马迁处在那样一个科学技术尚不发达的年代，人类的认识水平都很低，他终于还是摆脱不了这一历史背景，在他的《天官书》中，星占思想还很浓厚。但我们不能以此来否定司马迁先进的天文学知识，我们不能用现在的标准去要求 2000 多年前的古人，我们不能奢望司马迁从那样一个历史大环境中脱离了出来，喊着无产阶级的口号，誓扫一切牛鬼蛇神，那都是愚不可及的。实际上，相对于当时众多的学者来说，司马迁的思想已经相当进步了，他相信星占，但在星占与现实之间，他却往往选择现实，他星占的前提就是尊重现实，这是当时的许多星占家都做不到的。

地理方面，司马迁的学识更是让一般学者望尘莫及，且不说司马迁地理方面的书籍钻研了多少，仅凭他那对全国各地的实地考察，就够让人佩服的了。叙述历史事件、讲述历史经过，司马迁都辅以实际的地理环境，哪儿有山，哪儿有水，绝不凭空捏造，这没有详细的实地考察，是做不到的，尤其是描绘那些复杂的场面时，一沟一坎，都是敷衍不得的，司

马迁对此，从来都不含糊。

司马迁的医学思想，具体体现在《扁鹊仓公列传》中。扁鹊是传说中的神医，也是司马迁崇敬的人物之一，他医术高明，不慕权贵、不崇名利，对病人一视同仁，并且奔走各方，为四处的老百姓治病去疾，深受老百姓的敬仰。司马迁亦是抱着敬仰的态度来记述这位神医的事迹的，在叙述扁鹊生平的同时，他自然融入了他的医学观念。他认为，诊断病情比治疗疾病重要得多，高明的治疗技术，要建立在在对病情的正确分析、正确诊断之上，在对待“望、闻、问、切”四诊法的态度上，司马迁看重四诊的合力，认为只有将这四种方法都好好把握了，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扁鹊仓公列传》中，司马迁对中医脉诊有着精辟的论述，显示了他在这方面的高深造诣，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司马迁在此列传中首次记载了我国古代中医临诊病案记录的标准模式。司马迁的医学思想，同其他方面的成就一样，在中国历史上闪耀着不可磨灭的光辉。

《史记》的内涵极为丰富，在此我们无法一一表述。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通史，《史记》堪称“史家之绝唱”，在此之前的史书，或是历史材料的堆砌，或是一两件事的记述，或是某个地方、某个时代的记载，或是没有详细事实作根据的世系，都远远不足以反映我国古代历史的全貌。司马迁的《史记》，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其写作方法、写作态度、写作体例，都为后代人著史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同时，《史记》文章精美，又被冠以“无韵之《离骚》”的美称。这并不夸张。

司马迁是我国伟大的史学家，也是我国伟大的文学家。他的《史记》是汉代文学作品的佳作，全文精简得当、条理清晰，笔墨酣畅，跌宕有致，结构严谨。有的文章气势宏伟、豪放雄辩，有的文章饱含激情、苍凉悲壮，有的文章精炼简洁、十分率直，有的文章细致形象、感人肺腑，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事件，记人叙事各具特色。其中《项羽本纪》、《陈涉世家》、《魏公子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李将军列传》、《报任安书》等等，都是汉代散文的名篇，为历代人所传颂，是为传世佳作。

我们先来看看《史记》的风格特点。

司马迁虽然学了不少儒家经典，接受了不少儒家思想，但他思想的本质仍是道家，这同他父亲有着直接的联系。他父亲司马谈是西汉黄老之学（道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对道家思想有着独到的见解，虽然他没专门地去对司马迁进行这方面的教育，而且也是希望儿子学儒学，成为像孔子一样的儒学大家的，但耳濡目染之中，道家思想已对司马迁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深深地扎根于司马迁的头脑之中。他崇尚自然无为，顺其自然，承认自然、客观力量对人的影响，《伯夷列传》、《货殖列传》、《管晏列传》等之中，都有这种思想的直接流露，道家学说中的自然主义，普及于《史记》全书，使整部《史记》凝重之中不失舒缓，悲壮之中透着浪漫，或感情奔放，意到笔随，如泻江河，或朴实无华，清新朗丽，感情真挚。司马迁用道家的观点来评点历史。他欣赏张良颇具传奇色彩的一生，对张良遇黄石老人而得奇书一节，写得尤为精彩，给《留侯世家》（留侯即张良），蒙上了浓浓的奇丽

效果。他将“物极必反”、“盛极而衰”的道家观念贯穿于史事之中，李斯当了丞相之后门庭若市，前来贺拜的人络绎不绝，但事情总是“盛极而衰”，而后来落得个赴刑场的下场。

合理想象的运用，亦是《史记》的传神之处。钱钟书先生曾说过：“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史记》融 3000 年历史为一身，3000 年的人物、3000 年的事件，到司马迁时早只剩下了细枝末节，为了让人物丰满起来，让事件详实起来，司马迁发挥了充分的想象，去揣测当事人的心理、去捕捉当事人的举手投足的神情，使人物形神兼备，呼之欲出，细节描写，引人入胜。比如在《绛侯周勃世家》中，汉景帝召见周亚夫并赐食的一节，汉景帝对周亚夫已不赏识，并且存心想捉弄他，赐食周亚夫，却又不给周亚夫置箸，周亚夫心里愤愤不平，自己取了箸来吃，汉景帝笑他：“此非不足君所乎？”一语将其心态活灵活现地体现在纸上。司马迁根据事情发展的情形，来模拟当事人的心理活动、细小动作，几乎没有什么偏漏，堪称史家叙事的典范。

另外，《史记》中语言的运用，也是很精彩的。司马迁常常采用歌谣、谚语、俗语等来叙事或评点，从而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如《货殖列传》中引用谚语：“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及“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余。居之一岁，种之以谷；十岁，树之以木；百岁，来之以德”。《刘敬叔孙通列传》中，也引用了“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春申君列传》中也以俗语“当断不

断，反受其乱”来评述春申君的悲惨结局；《淮南衡山列传》中引民歌：“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楚元王世家》中，“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平原君列传》中，“利令智昏”，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与此相关的，口语的大量运用，也是古代文献的一大开创。司马迁在《史记》中引用古语时，都是经过了一番翻译的。上古语言晦涩拗口，使人难以理解，司马迁就代之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这样不仅好懂，而且也使远古的人、事鲜活起来。比如《尚书·尧典》中有一句：“畴咨若时登庸？”，在《史记》中，司马迁则使它通俗多了——“谁可顺此事？”，这样的例子很多。在叙述史事时，司马迁也是尽量要用淳朴的口语来达到一种清新自然的效果。如《汲黯列传》中，“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张释之冯唐列传》中，问唐曰：“父老何自为郎，家安在？”《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司马迁抛弃了晦涩的说法，力使人物的言行与性格达到统一。又如《陈涉世家》中，陈胜旧日的佣耕伙伴说的就是：“伙颐！涉之为王沈沈者！”《张丞相列传》中，口吃的周昌说的是：“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史记》中此类贴近现实的，富有浓郁生活气息的语言，显示了其广泛的人民性。

除此之外，《史记》中也常常引经据典，司马迁就像一位动作娴熟的烹饪大师，把上古经典一勺一勺巧妙地添加到对各个历史事件的评论中去，使之风味独特，更添意味，竟看不出添加的痕迹，经典之言早已和他的历史融为一体了。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我们就不必一一列举了。

司马迁在文学方面的深厚功底通过《史记》一一显露了出来。除语言的运用之外，《史记》的句式、语调结构等等，也都各具奇采。

拿《史记》的结构来说，《史记》就如一座宫城，里面宫厅楼阁、庭院水榭，皆错落有致，而每一宫殿、每一楼台的设计，又是各具特色，连庭院中花草的布局，也都是安排得妥妥当当的。从全书的设计来看，司马迁厚今薄古、详近略远，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天文、风土人情、日者龟策、游侠刺客、佞幸滑稽等等几乎是全社会的概括，有详有略地在《史记》中一一体现出来，并保持着各体之间的联系，如宫城中联系各个建筑的狭窄道路一般。并且在总体上寻求它们之间发展变化的总体规划，以“通古今之变”。在司马迁看来，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在这发展变化的过程之中，会出现不少积极的东西，也会出现不少弊端，传统的内容反映了历史，也体现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认识与创造，人们必须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历史，否则就把握不了历史的全貌；历史是由各种人物的活动组成的，人类的活动又是丰富多彩的，经济、政治、自然、传统等制约着人类的活动，因而看待历史时不仅要重视人的作用，而且要注重对制约人类活动的各种因素的研究；为了全面、准确、客观地反映历史、史学著作就应当是一个完整的社会体系，各类人物，都能在其之中找到归宿，各类事件，都能在其之中找到踪迹，当然，史学著作不是陈芝麻烂谷子的堆砌，它需要挑拣，它需要取舍，将有代表性的人物，将典型事件记述出来，就足以反映社会的全貌。因而司马迁在对整个历史材料的取舍方面，是

狠下了一番工夫的。“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或述帝王将相，或述儒林学士，或述游侠刺客，或述佞幸滑稽，社会各阶层各色人等，无一不包，或讲风土人情，或讲政治文化，或讲天文地理，或讲医学家教，人类生活的各方面，无一不揽。

《史记》从各篇来看，也都脉络分明、条理清晰。如《项羽本纪》，全文从项羽的家世写到项羽兵败自刎，其中涉及到波澜壮阔的楚汉战争，可谓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司马迁剪裁史料、或详或略，重要片断，加以重彩描绘，使楚霸王这一形象在激烈的矛盾冲突当中呼之欲出。全文浑然天成，其中“会稽起义”、“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等片断最为精彩，皆可独立成篇。《项羽本纪》成为历代传记文学的典范。

选材方面，司马迁立足于文章的主题，或详或略，或抑或扬。同一历史事件，在此处是长篇详述，洋洋洒洒几千言，在别的地方则一笔带过。同一历史人物，在这个场合唱主角，尽展人生风流，到那个场合就成了别人的陪衬。这些都是服从表现文章主题这一整体需要出发的。

《史记》在史学和文学方面的双重成就，使它成为历代关注的焦点。

唐宋古文运动时期，《史记》的文学地位得到了肯定，司马迁的散文，被古文运动倡导者推为正统。叶盛说司马迁“在汉为文中之雄”，李维桢认为“三代而下，文章之美，无如《史记》”。韩愈在评论柳宗元的文风时，说他雄深雅健似司马迁；柳宗元则以一个“洁”字评论《史记》——“参之

太史，以著其洁。”苏辙认为《史记》“其文疏荡，颇有奇气”，如此等等。司马迁的《史记》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肯定。

此后，对《史记》的评点不绝于案，历代的人们从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角度，对《史记》或褒或贬，或抑或扬，《史记》就在一片议论之中渐渐走向了大众。

明清两代，对《史记》的艺术评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明代，以茅坤、归有光为代表。茅坤认为《史记》“疏荡道逸”，其文风飘逸而不柔弱，亦不乏刚健之气，此外，他还大大肯定了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方面的独到之处，认为其“言人人殊，各得其解”，究其原因，是因为司马迁很好地把握了人物的心理，对事件发展的前因后果都有全面把握。归有光对《史记》更是推崇之极，他提倡学习《史记》的表现手法，但对《史记》的精髓，却没有真正把握住。

到了清代，《史记》评论达到鼎盛，出现了空前的盛况。尤以方苞、刘大櫟、姚鼐为代表。方苞讲求文章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以此来衡量《史记》，方苞认为“义法最精者莫如《左传》、《史记》”；刘大櫟着眼于艺术方面，认为《史记》有“大”、“远”、“疏”、“变”这四大特点，“大”——气势宏伟；“远”——文辞含蓄；“疏”——跌宕有致；“变”——善用词语。

各派人士，对《史记》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顾炎武对司马迁在记人叙事时，对地理方位方面的准确把握很是钦佩，同时他对司马迁变化多样的叙事方法也十分推崇；梁启超对司马迁记人叙事的手法，也作过专门的评论，肯定了司马迁

在叙事过程之中以小见大的方法；曾国藩亦以为《史记》之文“其积句也皆奇，而义必相辅，气不孤伸。”以“奇”来概括《史记》的特色。

近现代对《史记》的评论就更趋成熟了。鲁迅认为其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顾颉刚认为司马迁“独其创定义例，兼包巨细，会合天人，贯穿古今，奠史学万祀之基，炜然有其永存之辉光，自古迄今，未有能与之抗颜而行者也。”赞《史记》：“‘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实为吾国史事第一次有系统的整理。”

越来越多的人对《史记》给予关注，越来越多的人对《史记》进行深入研究。目前有关司马迁及其《史记》的研究书目越来越多，对于司马迁，历史给予了他应有的地位，对于《史记》，也将永远在中国的历史文献宝库中闪耀着永不磨灭的光辉！